

美国史研究通讯

The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0 年第 2 期

(总第 105 期)

主 编：王 旭
副 主 编：胡锦涛 韩 宇
责任编辑：韩 宇 杨长云
校 对：张卫国 李文硕
陈政禹 孙彦妮

出 版 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出 版 地：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1 年 3 月

本通讯的内容亦刊登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

www.ahrac.com

目 录

名家随笔

和而不同——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友谊..... 刘绪贻 (1)

沉痛悼念我会原名誉理事长黄华先生和武汉大学李存训教授

原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同志讣告..... (10)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唁电..... (10)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存训先生讣告..... (10)

悼武汉大学美国研究专家李存训教授..... 黄安年 (11)

李存训教授学术简历..... (12)

留美历史学人

火的洗礼..... 王 希 (14)

浮生三记..... 徐国琦 (29)

美国纪行

周末宾州之旅..... 洪文迁 (41)

书评

持续的开拓,不断的创新——评《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 孙群郎 (43)

学术动态

我会多名会员获得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49)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研讨班..... (49)

王晓德教授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50)

王旭教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学..... (50)

李剑鸣和王晓德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51)

王晓德教授在浙江大学讲学..... (52)

高春常教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 (53)

韩宇副教授在波兰华沙大学访学..... (54)

会员动态..... (55)

新书讯..... (56)

会议预告..... (59)

编后记..... (62)

和而不同

——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友谊

刘绪贻口述 赵晓悦整理

(一)

斯坦利·柯特勒 (Stanley I. Kutler) 退休前, 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 美国史与美国制度的讲座教授, 著名历史学、特别是法律史学家。他也是《美国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杂志的创建者, 并长期任其主编。他还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史丛书》的顾问编辑。他的著作涉及美国史的许多领域, 特别集中于立宪史和 20 世纪史。其主要著作有:《滥用职权: 新发现的尼克松录音带》(自由出版社, 1997);《水门事件的斗争: 理查德·尼克松最后的危机》(克诺普夫, 1992);《美国的严酷审讯》(希尔与王出版社, 1982; 中译本为《美国八大冤假错案》,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1983 年曾获美国律师协会银槌奖;《特权与创造性的毁灭: 查尔斯河桥梁案》(诺顿出版社, 1978);《司法权与重建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8)。此外, 他还在美国史的各种不同领域著或编有半打以上的教科书, 其中有《最高法院与宪法》(诺顿出版社, 1969, 1977, 1984;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有中译本)、《探索美国》(诺顿出版社, 1975, 1980)。一些顶级的历史和法律期刊发表过他的学术论文; 他的各种参考性著作获得过许多奖项: 由他编辑再版的《美国历史辞典》(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2002) 荣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工具书奖”; 他还参编《美国 20 世纪百科全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1995) 和《越南战争手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 1996), 前者获“图书出版协会最佳工具书奖”, 后者获“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工具书奖”。

柯特勒多次被邀请到国外讲学并获奖。他曾是古根海姆奖的获得者; 1991 年, 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政治学的加里波第讲座教授; 1982 年, 以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杰出交换学者”身份到中国讲学; 1987 年, 在秘鲁获得福布莱特 40 周年纪念会“杰出演说家”称号; 1984 年, 任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两百周年项目”教授; 1977 年, 以“福布莱特演说家”身份到日本讲演。

柯特勒兴趣广泛、多才多艺, 热心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艺术活动。他经常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和评论, 作品见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民族》杂志、《高等教育编年史》、《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州报》、《沙龙》、《美国展望》等多种知名报刊。他时不时地作为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以及“今日”、“夜线”等多档电视栏目的评论家, 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此外, 他还担任电影制作顾问。由他出任历史顾问的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水门事件》曾赢得艾美金像奖;

Showtime 电视台邀请他指导电影《罗纳德·里根被袭击的那天》的拍摄；HBO 电视台则把他的著作《水门事件的斗争》选为拍摄素材；他与编剧哈利·希勒合写的荧幕新剧《我，尼克松》将于 2010 年 3 月在芝加哥制作完成。

(二)

柯特勒是美籍犹太人，对中国具有兴趣和同情心，乐于促进中美两国及其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1982 年 5 月，他通过美国的“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得到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以杰出学者身份来中国讲学，先到北京，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接待；由于我当时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在北京讲学完毕后，就前来我所在的武汉大学进行访问。5 月 11 日，我们第一次会面；12、13 日，他在武汉大学做了面向全校学生的学术报告；14 日，他和历史系对美国史感兴趣的师生进行了座谈。在这些活动中，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听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的大体印象是：他介绍了美国当时美国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和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情况；他在谈论他对美国历史的看法时，既讲光明面，也不隐瞒阴暗面。我们也向他介绍了我校美国史研究室和当时中国美国史学界的研究概况和我们对美国史的大体看法。他回国以后，我们还保持通信联系。

1983 年初，他给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黄绍湘理事长写信，告诉她：他正在筹备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名称是“外国人看美国史”；会议的主旨，是邀请一批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美国史学者，将自己优秀的美国史著作提交会议，供全体与会者自由评论，存异求同，并集结出版，介绍给美国读者；会议的地点，在意大利贝拉焦半岛的洛克菲勒研究与会议中心。他邀请黄绍湘、杨生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我一同参加，黄绍湘给他回信说，她不参加。于是，7 月 11 日他给我写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诚恳而迫切地希望我能接受邀请。我接此信后，进行了仔细的思考。首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向将美国人民和美国统治者区别对待的，和一个一般美国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是很正常的事。其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人，长期以来我有一种想法：人类生活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具有全人类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中，比起生活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是更为安全、更为和谐、更容易发展和进步的。当前国际社会的科学技术如此发达，交通和通信技术如此便利，人类的交往和联系如此频繁而紧密，这种趋势，是有利于、而且已经在渐渐促进民主、法治并具有政治共同体的全人类社会的建设的。欧洲联盟提供了一个雏形。但是，由于目前的国际社会仍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各主权国家的人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各不相同，建设这样一个全人类政治社会的进程，是有很大大阻力因而非常缓慢的。为了消除这种阻力，加速这一进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负有主要责任，以一种同情和宽容的“世界公民”的心态，追求真理的热情，人道主义的精神，从各种不同的途径，采取各种不同措施，创造和不断加强一种“和而不同”的各色国际交流环境和机制，作为温床，孕育和促进上述具有政治共同体的全人类社会的诞生和成长。从柯特勒教授在中国讲学的经历看，他是在致力于创造这种“和而不同”的国际交流环境与机制的；他正在筹备的贝拉焦国际学术会议，也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国际交流机制。出于以上的考虑，我

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这次会议定于1984年6月4—8日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从马列主义观点看美国现代史》。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冒着风险试写的第三篇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影响的美国史论文，完稿于1983年2月4日。当时湖北省理论界仍然相当保守，由于此文中有的论点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个别论点不一致，我觉得此文在湖北地区难以发表，于是“明知故犯”地寄了一份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一份给理论界掌门人胡乔木，一份寄给我熟识的《历史研究》编辑严四光。后来，只有严四光给我寄来5份该文的打印稿（据李慎之同志以后告诉我：严四光曾将此文打印稿寄给北京理论界某些头面人物征求意见，大约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历史研究》就未发表此文）。另外，当时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夏邦新听说我写有一新观点的论文，曾于3月17日前来取去一份，看看能否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和省社联联合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会议上宣读或者印发，但他们审读后，还是退了回来。

正当我感到这篇论文将无法见天日时，我接到柯特勒教授7月11日的信，信中还让我提交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写的美国史论文。我接此信后，一方面感到高兴，因为这篇论文有派上用场的可能；另一方面又觉得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我知道，当时党内有规定，凡是未公开发表的著作，要提交国际学术会议，必须先取得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批准，而武汉大学当时党委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傅健民不懂学术，他这一关是很难通过的。果然，武大党委一直拖着不给我答复，后经我一再催促，才给一含糊其辞的答复：“你的论文与列宁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不一致的，请你慎重考虑。”我不得已，才想到比较开明的上海学术界。1983年12月13日，我将论文寄给同情我学术观点的上海青年学人王毅捷，他和上海《社会科学》编辑张家哲研究后，让我将论文压缩到10000字，在上海《社会科学》1984年2月号上发表了。这样，我才赶在贝拉焦会议1984年4月1日截止收稿期前寄去了论文。

贝拉焦会议虽然接受了我的马列主义的论文，但它对我的论文表示冷漠。不独在我宣读论文摘要后未予认真的讨论，在下午我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和号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法国第八巴黎大学女教授玛丽安娜·德布齐意见时，他们都公开声明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当时很生气，向会议主持人提出要求，给我机会，让我对这次会议的本身提出批评意见。

可喜的是，这毕竟是一次“和而不同”的国际学术会议，它虽然对我的论文冷淡，但不独允许我对这种冷淡提出批评，并且对我的批评表示了真诚的认同和很高的赞赏。会议的最后一个下午，他们给了我充分发言的时间。除说明我当时仍然相信非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的原因之外，我还严肃地指出了这次会议的缺点。我说：“既然会议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国美国史学家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我认为我是这样做的。我研究美国罗斯福‘新政’，美国有关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我都是涉猎过的。但是我认为，参加会议各国学者对马列著作很少涉猎。比如，法国德布齐教授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她在会上的发言虽有思想，却连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常识都弄错了；她不独未读我论文全文，甚至未细看我的发言稿，就说里面没有新东西，这能有助于我们的交流与了解吗？中国有10亿人，许多人相信马列主义；苏联是个大国，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许

多人相信马列主义；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中，也有些人相信马列主义。因此，如果大家只想在自己国家里做个大学教授，过舒适安定生活，不研究马列主义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可能受到联邦调查局那一类机关的纠缠。但从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的责任来考虑，从马列主义产生以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考虑，大家这样不关心马列主义，是很不应该的，也是不利于我们之间的交流与了解的。我认为，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美中不足。”

我发言时，大家认真地听。发言完毕，大家热烈鼓掌，纷纷前来和我握手，向我祝贺，说我发言很及时、很有使命感，很为人类前途着想。作为会议组织者，柯特勒教授一再向我表示，说我对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是完全正确的。

(三)

贝拉焦会议后不到半年，我又接到柯特勒教授 1983 年 11 月 7 日的信。他告诉我，他已向美国的“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提名我为该委员会“杰出交换学者项目”1984 - 1985 年中国方面候选人。这个委员会成立于 1966 年，是由美国各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科学院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联合赞助的，其经费由政府机构和民营基金会提供。1972 年起，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互派代表团。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以后，着重进行各种个别学者的交换和双边会议的赞助。柯特勒 1982 年以杰出学者身份访问中国，就是由该委员会的“杰出交换学者项目”资助的。

1984 年 8 月 10 日，柯特勒来信说，他对我的提名已获批准。我可以以“杰出学者”身份得到资助，从 1984 年 11 月 1 日起，赴美国作为时两个月的讲学、访友、研究活动。他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历史系将是我的东道主。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份详细的旅程。11 月 1 日至 4 日，我在旧金山，除参观金门大桥等景点外，主要是到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书库选书。亚洲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其目的在于促进一个和平、繁荣、正义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它的主要项目之一是向亚洲国家和地区赠书，其对华的赠书项目始于 1980 年。当时我到该书库为我们美国史研究室选书 200 余本，这当然对我们研究室的工作很有帮助。其次，经友人的介绍，我参加了一对美共（马列）党员夫妇组织的舞会，丈夫为华裔，妻子为美国人，他们告诉我，参加这次聚会的客人，一半是激进分子，一半是自由主义者。柯特勒虽然不一定情愿我参与这一类活动，但他完全宽容我的任何选择。

4 日晚我到了麦迪逊，12 月 2 日才离开。我其所以在这个城市逗留 28 天，主要是听从了柯特勒的建议，让我广泛且深入地接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非常有建树的史学研究工作。这个学校曾出现过以约翰·康芒斯为首的劳工史学派，以威廉·威廉斯为首的外交史学派，和以 J.威拉德·赫斯特为首的法律史学派（柯特勒即该学派主要成员），当时仍拥有一批富有成就的美国史学家。另外，该校拥有丰富的历史学藏书，除总图书馆收藏历史图书外，还有一个原属于威斯康星历史学会的历史图书馆，专门收藏美国史、加拿大史和威斯康星州史的图书。

在这 28 天中，我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其一，我在历史图书馆中抄录了有关 20 世纪美国史的新书目录约 550 种，还重点浏览了这一世纪各个时期的关键著作。可以说，

这项工作为我们美国史研究室日后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冲破二战后的禁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二，我补写了《35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一文，并将之翻译成英文本 American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作为我在美国讲学之用，并于11月27日向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做了报告。其三，我与几位历史系教授和一位政治系教授进行了个别的交流，虽然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评价，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认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等，常有歧见和争论，但彼此相互理解与宽容，态度始终是友好的。

在麦迪逊期间，我对这所大学的国际性形成了明确的印象。威斯康星建州于1848年，翌年即在州首府麦迪逊城建立威斯康星大学。从很早时期起，该校就很重视自己的国际性和国际形象。1874年任校长的约翰·贝斯甘姆说：“在国外所受尊敬及容纳更多外国学生，会提高一所大学在国内已得到的评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广阔的胸襟，我们便不能获得扩充生命的力量。”以后该校董事会和领导人也有类似言论。1984年11月15日，该校校长欧文·谢恩约见我时说：“我很高兴本大学是个国际性大学；全校3万多名学生中，外国学生有3500人，约占1/10，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学生达540人。”他给我的名片上有中国名字“沈艾文”。他告诉我，他生于华人较多的西雅图市，从小学到大学都和中国或中国裔的同学交往，养成一种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菜的习惯，而且诚恳地表示，他们学校愿意和武汉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为保持和发扬国际性，该校除设有外国师生办公室，帮助外国师生办理登记、注册、开展社交活动和解决某些生活问题外，还鼓励和支持一些群众组织与活动，如麦迪逊国际学生之友社、国际学生协助中心、促进国际联谊夫人组织、家庭寄宿计划、美国家庭招待计划等，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般是志愿性的，他们还免费辅导外国学生提高英语水平、补习功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该校还专门设有一“与中国联络员”。在我访问期间的联络员是玛乔丽·约翰逊夫人，她曾数次访问中国，也到过武汉大学。我初次见到她时，她就十分热情友好，11月22日是感恩节，她担心我一人感到寂寞，让她的丈夫、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开车来接我到她家晚餐。一到她家，看见到处是中国的工艺品和文物，客厅四壁挂满了，有一副对联只好挂在走廊里。餐桌上的客人除我以外，还有日本、玻利维亚、赞比亚、马来西亚的男女留学生，席上气氛轻松愉快，约翰逊夫人的谈锋有个基调：尽管国籍、民族、政治与学术见解不同，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前途，人们都应该而且可以成为朋友，为促进国际友好与合作而努力。

12月2日至5日，我访问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人是前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杰斐逊勋章获得者，美国历史丛书主编、著名黑人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教授。我在杜克大学历史系作了“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的报告（也有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教授参加），参加了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的学术讨论会，和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尤金·吉诺维塞夫妇共进午餐，并与著名20世纪美国史学家、美国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董事、《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作者之一的威廉·洛克滕堡教授讨论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另外，还和富兰克林教授及其同事讨论了关于林肯总统评价、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低潮、里根政权性质以及里根竞选胜利原因等问题，有相同的观点，也有歧见。

12月6日，我抵达弗吉尼亚科技大学。次日，该校历史系教授汪荣祖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中的一段小插曲值得一提。1983年7月，上海《社会科学》发表了经济学家熊映梧的一篇震撼世界的论文《从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认为《资本论》存在局限，未必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而当代的资本主义并非腐朽、垂死的，仍旧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这篇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公开挑战《资本论》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海外首先是日本、香港重要媒体的重视，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并予以转载。当时出席欢迎酒会的，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的该校十大“杰出学者”之一的罗伯特·马沙克（Robert Marshak）。经汪荣祖介绍后，他就握着我的手，非常兴奋地向我提及熊映梧的论文，并非常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政治气候很快将比较宽松，学术研究将比较自由。但我并不像他那样激动，因为据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认为这乃是一些美国学者，尤其是像马沙克这种不太熟悉政治的自然科学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过分乐观的愿望和幻想，并不一定代表中国政治和社会未来的走向。

接下来我前往纽约，从12月9日至22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学活动，会见了几位在当代美国史学界深具影响力的学者。我与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美国史学界头面人物、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的小阿瑟·施莱辛格教授共进午餐时，谈到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历史发展趋势问题，他还告诉我正准备动手写《罗斯福时代》第4卷。17日，美国各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约翰·威廉·沃德教授请赴晚宴，在座的有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主席肯尼思·普鲁伊特，纽约人文科学研究所威廉·泰勒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著名劳工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曼等人。他们就美方较大规模援助我国美国史学研究问题交换了意见。格特曼教授向沃德教授提出建议，资助我们撰写六卷本《美国通史》的主编们及主要作者于1985年年中访问美国，由美国方面邀请一批史学家提供咨询意见，并补充资料。在翌日的单独会面中，沃德教授向我透露了他们正在酝酿的计划：征集50万美金，帮助我国建立6个美国史图书馆，为我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格特曼教授及其夫人除请我赴家宴外，还提出了帮助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工作的具体计划，这些我在另一回忆文章中谈过，这里就不重复了。非常不幸的是，1985年沃德教授因故自杀，格特曼教授的讣告也于同年传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事业原本有望得到的大力援助与美好前景，因而流产。

此外，我在纽约还参观了《每月评论》杂志社，会见了该杂志的创办者、著名进步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教授及其亲密同僚哈里·马格多夫。斯威齐曾被《纽约时报》誉为“美国在冷战与麦卡锡时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出版家”，他和马格多夫让我从每月评论出版社的书架上选择了10余种他们的主要著作，次年寄赠给我。19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后来成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新左派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与我会面，除赠书两册外，还带我到旧书店选购图书，并表示了访问我国的愿望。我们谈及他的叔父、美国共产党的主要学者菲利普·方纳时，埃里克认为，美国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我在美国访学的最后一站，回到了40年代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此时学校已经放假，我只见到该校历史系主任、美籍日本人入江昭教授。27日至29日，美国历史协会1984年年会在芝加哥召开，我与柯特勒、富兰克林、洛克滕堡等诸多历史学家再次见面。时

任该协会主席的阿瑟·林克教授是美国研究威尔逊总统的权威学者，我曾翻译过他著名的教科书《美国世纪：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他对美国20世纪前30年历史的研究让我受益良多，这次年会会使我们有缘相见、互致谢意。另外，美国的一些主要出版商都在年会上举行展销活动，我通过富兰克林等人的帮助以及自己的争取，获得了30余本赠书。

纵观这两个月来我在美国的讲学、访友和研究工作，我认为是很值得的。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我的美国史研究成果极难避免公式化，大都只能是老生常谈。从1979年起，我们接触了一些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史学者，读了一些这类学者的著作，了解到许多左倾教条主义美国史学者有意无意弃而不顾的大量美国史实和不同观点，我对美国史的视野便忽然扩大了，对美国史的看法就更全面了。到1983年，我已写出3篇反左倾教条主义的美史论文，一本具有新内容的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讲义。但是，这还是很不够的。正如柯特勒在提名我以“杰出学者”身份访美的信中所说，要真正地研究好美国史，对美国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还应再访美国，尽量接触极其丰富的各种美国史资源，与众多优秀美国史学者交流。应该说，两个月来，柯特勒教授一直是在帮助我接触尽可能多的美国史资源，会见尽可能多的优秀美国史学者的。不仅如此，出于自身的学术旨趣和政治立场，柯特勒邀请我到美国，最希望我会见的是主流派亦即自由主义的美史学家，最希望我阅读和接触的是自由主义学者们的著作。但是，当我提到会见美国共产党史学家菲利普·方纳、新左派史学者埃里克·方纳和尤金·吉诺维塞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等人时，他也非常谅解、宽容，尽可能帮我联系。他自己虽不相信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著作没什么兴趣，但对我阅读和购买这类读物，却完全无介于心，处之泰然。因此之故，这次访美之行，我的收获的确是很大的。

(四)

1984年12月我仍在美期间，就接到柯特勒的信。他告诉我，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已批准他再次以“杰出交换学者”身份访问中国3周。后来经过多次协商，他决定1986年5月与夫人一同来华，主要在武汉大学讲学，也希望访问上海复旦大学，并去一趟北京。1986年5月12-23日，他在武汉的活动如下：由我主持，他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权力与法制”的系列讲演，讲题为：政治理论与宪法，美国的司法复审权，法律、政府与经济，种族与民权革命，公民自由：言论自由问题，“帝王式”的总统职务；在我参与下，他指导美国史研究生论文写作共4次，论文题目为“战后美国工人运动”，“战后美国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70年代的美、苏关系”，“卡特政府时期在美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沃伦法院”，“战后总统与国会的关系”和“战后美国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他和美国史研究室李世洞和谭君久两位老师分别讨论了美国宪法史学问题和两党制问题。另外，还到华中师范大学与有关教师座谈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的关系问题。

除讲学活动外，我还陪同他们夫妇参观了武汉市主要景点，和韩德培教授分别举行家宴招待了他们夫妇。经过这次比较长期的、密切的、个人间的接触和交流，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似乎有了一定的质变。大体上可以说，我们互相理解，互相信任，互相钦敬；我们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已经基本超越了国籍与意识形态的歧异，而是站在全人

类利益与幸福的立场，但凭理性与理想相互交往，为人处事。他在访问上海复旦大学与北京时来信，对我和我的研究生（特别是韩铁和徐以骅）赞扬备至；回国以后，又和我商议 1987 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双边学术会议，讨论美国宪法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美之间的定期学术讨论会，不断增进两国、两国学者与人民的了解与友谊。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要求和听取我提供信息和建议，我也无私地、真诚地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两国定期学术讨论会的设想未能实现。

在柯特勒的心目中，似乎有一个不论政治体制的人民的美国，所以在 1989 年“六四”风波期间，他不像美国政府和有些美国人那样，谴责和要求制裁中国；却在当时给我的信中，和我一样忧心忡忡，深深叹惜中国似乎还看不出有一种政治力量，在短时期内能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而他是满怀这种愿望的。在他的心目中，似乎也有一个抽象的人民的美国，所以他认为 1987 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是未经思考的轻率行为，是某些压力集团强逼出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合情合理。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可以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以上我对柯特勒教授思想和人品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所有论述，并非捕风捉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本文第一节中，我曾提到 1982 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美国的严酷审讯》，1997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它的中译本，译者为我的小儿子刘末，书名改为《美国八大冤假错案》。作为本书的校者，我仔细读过这本书，并反复思考过作者撰写这本书的动机和目的。书中描述的八大冤假错案，都产生于美国一个很不光彩的年代。当时，美国对外与苏联进行冷战，国内则有狠骗恶诈、卑鄙无耻的麦卡锡主义横行。揭发这个不光彩时期造成的重大丑恶事件，显然是揭露美国社会的最黑暗面。柯特勒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呢？难道作为美国公民，他不爱国？但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和一般庸俗的爱国者不同；他所爱的是一个现代文明的美国，一个对外与其它国家和平共处、对内民主法治的美国；一个容忍甚至制造八大冤假错案的美国，他是不爱的，是禁不住要进行揭露批判以求其不再重现的。

1994 年初，《美国八大冤假错案》中译本即将完稿。2 月 26 日，我接到柯特勒来信，他说他愿意为中译本写几句话。3 月 2 日我回信说：“我们自然很高兴你能为中译本‘写几句话作为一个新序言’。我喜欢这本书，同意你对美国政治体制与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的比较论述。我羡慕你能在美国撰写并出版以人类的正义描写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的书，……。亲爱的朋友，我非常欣赏你写此书时体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崇高感情。当我读你的书时，我也在读一种正义的、无私的心灵。这就是我们这些没有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能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

实际上，柯特勒不仅写这本书时具有这种高尚的思想感情，写其他著作大体也如此。比如，他为什么在“水门事件”逝去多年以后还要写《水门事件的斗争》这本书？他把尼克松钉在美国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位总统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因为尼克松不仅从事犯罪活动，还很不诚实，而一个不诚实的总统是会摧毁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我管理的社会的传统。尼克松因犯有这种严重罪行被迫辞职后，他和他的某些同犯还一再为他辩护，将“水门事件”轻描淡写成他们与东部权势集团一系列斗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对此情形，柯特勒当时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心境难平”。他认为，不彻

底地揭发造成“水门事件”的社会根源和尼克松人品的不良影响，不对“水门事件”之争的是非曲直讲个清楚明白，是会对美国的政治伦理造成长期不良影响的，他的心情也是难得安宁的。直到今天，他仍然不断地给我发来批评美国政府不良政策的文章，力求保护他心目中那个人民的、现代文明的美国。

屈指一算，我与柯特勒相识相交已经 28 年，虽然各自生活工作在政治制度不同的两个国家，却始终保持着诚恳而亲密的交往和友谊。直到现在，我们还时常通过电子邮件互致问候，交流思想感情，议论世事，臧否人物。何以如此？我想，大概是因为作为喜欢干预社会政治生活的学者，我们两人对有关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有着许多相似的看法；即使在某些问题上有歧见，却能相互宽容和谅解，为自由交流思想和感情保留足够的空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让这段 28 年的友谊葆有持续的生机。

2009 年 12 月 26 日于求索斋

沉痛悼念我会原名誉理事长黄华先生和武汉大学李存训教授

原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同志讣告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黄华同志，因病于 2010 年 11 月 24 日 3 时 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唁电

黄华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黄华先生不幸逝世。不胜悲痛。黄华先生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先生 1993 年被聘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和走向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黄先生的逝世，是我国美国史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全体会员深表哀悼。

黄华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0 年 11 月 26 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存训先生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存训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中午在医院不幸逝世，享年 78 岁。

李存训先生 1933 年生于湖南省武冈县，1962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196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 1962 年 9 月起在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教研室任教，李先生热爱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战后美国外交史》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李先生一生致力于美国现代史的研究，参加编撰、编译了《战后美国史》、《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美国研究词典》、《1900 年以来的美国史》等著作，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获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李先生退休后还一直关心武大世界史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多次提出建议。

遵照李先生的遗嘱，丧事从简。遗体定于 12 月 11 日在武昌殡仪馆火化，历史学院将为李先生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凡李先生生前友好欲致吊唁者，可于 11 日早晨 7 点半在老干部中心前乘车前往。谨此讣告。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10 年 12 月 10 日

悼武汉大学美国研究专家李存训教授

黄安年

武汉大学美国研究专家李存训教授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静悄悄。我是昨天从邓蜀生那里获悉这一噩耗的，老邓说前两天李世洞在电话中告诉他这一不幸消息。昨晚我给世洞发信求证，今早接获回信：“李存训患胰腺癌，发现时已是晚期，没有拖多久就病逝了，逝世的时间是 12 月 10 日（大概）”。存训真的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记得 80 年代中期，我和冯承柏教授去武汉大学为刘绪贻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卷初稿通读，存训是参与编写的作者之一，近半个月时间里和我们朝夕相处，令人难忘。2008 年 5 月下旬在武汉大学举行中国美国史年会期间，存训虽然没有与会却专程来会场看我，还在会场外和刘先生、王锦塘、我一起合影。我回京后写了一篇短博《在武大见到老朋友李世洞、李存训和王锦塘教授》（黄安年的博客/2008 年 6 月 2 日发布），文中谈到：“5 月 23-27 日武汉行日程安排得很紧，见到了很多老朋友，像李存训教授和王锦塘教授已经有 20 多年没有见面。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多年，他们当年在美国史研究领域是出色的中年教师，这次在会上许多人包括武汉的研究生都不认识他们了。想起来，武汉大学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申请成功博士学位授权而使一代人受损，当年南有武大北有南开格局现在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想到这些，我对武大的老朋友格外有种敬重之情。他们作为美国史研究者的个人研究仍在继续，他们依然关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活动。在大会开幕式的那天，我和刘绪贻、李存训、王锦塘先生一起合了影。”从那以后，我和存训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张合影竟成了最后的留念。

存训为人低调，实干而不张扬，是刘绪贻美国研究团队的得力助手，他不仅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通史》第 6 卷（《战后美国史》），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个人学术成就斐然，是我崇敬的美国研究专家之一，他的过早去世令人感到惋惜。也为武汉大学团队的学术命运感到惋惜。

李存训教授学术简历

李存训，男，1934年7月生于湖南省武冈县，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自1964年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成立之日起，就专职从事美国现代史和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通史》第6卷（《战后美国史》），1990年获第4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主要科研成果：

一、著作：

1. 合著《战后美国史》（1945-1986），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2. 合著《战后美国史》（1945-2000），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3. 合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6-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4. 合著《美国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5. 合著《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6. 副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7. 合著《战后美国第六次经济危机》，商务印书馆1978年11月第1版。
8. 合著《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9. 合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全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二、论文：

1. 《1974-1975年美国经济危机对第三世界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5期。
2. 《美国南北战争后农业迅速发展的特点和原因》，《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
3.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
4. 《论杜鲁门的公平施政》，《1981-1983年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3年版。
5.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是新政的继续和扩大》，《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
6. 《美国怎样夺取英国世界霸权》，《世界历史文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7. 《希特勒德国为何未能造出原子弹》，《世界文化之谜》，文汇出版社1986年版。
8. 《原子弹的研制和第一次使用》，《外国历史大事记.现代部分》，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9. 《战后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美国研究》，1988年第5期。
10.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冲突》，《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5期。
11. 《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新特点》，《兰州学刊》，1989年第5期。
12.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重大变化》，《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

13. 《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动机何在》，《世界文化之谜》，文汇出版社 1989 年版。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美国研究》，1994 年第 1 期。
15. 《平生敢作湘累问，不用扬鞭自奋蹄——访著名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教授》，《社会科学动态》1993 年第 7-8 期。
16. 《刘绪贻先生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新贡献》，《世界历史》，1994 年第 5 期。
17. 《刘绪贻先生小传》，《社会科学动态》，1995 年第 1-2 期。
18. 《刘绪贻先生的学术道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

◆留美历史学人◆

编者按：2010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该书所录文章大致分为三个类别：个人学术生涯的回忆，主要是在美国求学和执教的经历；对美国学术界的观察和评论；对个人在美治学的梳理和对研究领域现状的评估。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言，“这些篇章绝不只是即兴而发的感怀和拾遗，它们凝聚着一群在特殊历史时段和空间走到一起的中国历史学人的磨难和思考，记载着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与成长。这里记载的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精神——为追求学识知难而进，为追求真理在所不惜”。在此，我们与各位会员分享这道精神盛宴。大家读后有何感想，欢迎投稿！

火的洗礼

王 希

“火的洗礼”(baptism by fire)是《圣经》语言，在口语中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在没有经验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遇逆境考验的情形。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也并非人人都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历经“火的洗礼”的人，却大都会对人生抱有一种新的感悟。他们能意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会对命运抱有一种敬畏感，更会对在自己无助时施以援手的人没齿不忘。许多留美历史学人的经历都可以用“火的洗礼”来形容，我也不例外。

出国故事

我的出国故事没有一波三折的复杂情节，反而像是一部天方夜谭。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从重庆下乡到四川内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所在的生产队极为贫困，一个男劳动力的全日工在年终结算时仅值八分钱。我在那里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感受到农民的淳朴善良，但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们在应对乡村社会各种权威时所表现出来的谋略与胆识。我后来研究美国黑人的历史，时常会“移情想象”，下意识地回忆起集体遭受体制性歧视的中国农民。1976年，经生产队推荐，我入伍当了铁道兵，因对无线电技术略知一二，被分配去放电影。1978年，部队在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当时属吉林省）上修建通（辽）霍（林河）铁路，我从广播中听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的消息后，便致信教育部，询问现役军人是否可以参加高考。此事为领导得知的同时，部队也接到了推荐战士参加高考的通知，我因而得到了一个同时参加部队和地方院校考试的机会，并分别为铁道兵工程学院和河北大学外文系录取。录取通知书送达时，我正在为施工部队放电影，没有见到邮递员，只听说他是坐着毛驴车来的。1982年我从河北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时，恰遇铁道兵实施“兵改工”，我得以脱下军装，留校任教。一年之后，我到四

川大学参加一个英美文学暑期班，在那里认识了来自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的文学教授理查森（Robert D. Richardson, Jr.）。

理查森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专长于研究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在暑期班上，他指导我们阅读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英美文学。当时我们对这些作品普遍感到陌生，尤其是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这部长诗使用了大量隐喻，写作手法标新立异，令人难以驾驭。我虽读得似懂非懂，但却为弥漫在字里行间中的那种情绪——迷惘与失落——所深深感染。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探索和学习的气氛很浓，不知为何，我反而陷入了一种困境：渴求知识但无从入门，精神亢奋却茫然无举。我的困惑显然影响了我的写作。我对《荒原》的评论（暑期班的结业论文）引起了理查森的好奇：没有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底蕴，中国学生是如何理解艾略特的意境的呢？我们之间因此有了许多的讨论。川大附近有许多茶馆，我们坐在竹椅上，一碗沱茶在手，无拘无束地谈话，这种场景已成为永久的记忆。理查森学识渊博，谈吐优雅，平易近人，让我见识了什么叫做“学者”。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种交谈的重要，用早年清教徒的话来说，它指引我发现了自己的“使命”（calling）——对思想和学问的追求。

与理查森教授的邂逅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他回到美国后，先是寄来一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我们在交谈中曾提到这本书，他没有忘记。他随后又来信说，希望我能到美国深造，但考虑到从英文系获得助教奖学金的困难，建议我主修历史，兼修文学。我当时已经感到，没有历史功底的支持，英美文学研究难以远行。所以我即刻表示赞同。经理查森的推荐，我获得了丹佛大学历史系的录取与资助，进入该系读美国史的硕士学位。当时，自费留学在国内尚属“新生事物”，办理因私护照需经层层审批，校系均不情愿我离去，但因我当年也考取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学校最终也就不再为难我，予以放行。1984年8月28日，我从北京经旧金山抵达了丹佛。

丹佛入门

我当时决定改学美国史，实在有些胆大妄为。出国前，我的史学训练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大学里选过的两门历史课——“国际共运史”、“中共党史”——都不涉及史学研究。外文系的“英美概况”最多只能算半门历史课。授课的袁伯樵教授早年留美，自编英文教材，并用英文授课，对我了解美国史的脉络有帮助，但史学研究不在教学范围之

理查森教授的著述甚丰，后来被同行誉为是“二十世纪美国最佳的人物传记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Robert D. Richardson, Jr., *Literature and Film* (New York: Garland, 1969), *Myt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Henry Thoreau: A Life of Mi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Emerson: The Mind on Fire: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该书获得 1996 年度帕克曼人物传记奖和梅尔切书籍奖; *William James: In the Maelstrom of American Modernism: A Biograph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该书获得 2007 年度班克罗夫特美国史学著作奖; *First We Read, Then We Write: Emerson on the Creative Process* (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09)。

内。尽管如此，抵达丹佛时，我一点不感到慌张，反而觉得自己能够学有所成。我们成长的年代是艰苦的，却也练就了敢于想象、敢于闯天下的勇气和胆量。无非就是再过一次插队的生活，有什么可怕的？

然而，一走进课堂，我立刻意识到，在美国学术界“闯天下”，仅有胆量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更需要的是能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思想能力和语言能力。学史如同学手艺，先要入门，需要长久的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需要熟悉特制的工具（史学语言）、掌握特殊的技能（研究方法）、遵循特定的规矩（学术规范）。只有在完成这个程序并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论文）之后，方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成为专业历史学家。换言之，史学训练是一种“皈依”的经历，一个人先前的知识内容、知识结构、思想方式、甚至语言习惯都将在这个过程中被转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信守承诺。真心做学问的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留学生的辛苦之处在于，这个皈依的过程是在一个“异”文化和“他”国度的背景下进行的，并必须学习他人的语言。（推崇后现代的人会说，留学生是“他者”，在国外学习时占有视角的优势。此话不假，但问题是，如果不首先进入“本体”的知识和思想体系，“他者”是没有意义的，而一旦进入之后，“他者”又往往不再成其为“他者”了。）

进入丹佛大学时，我当然不会有这样的认知。当时想的最多的是如何立足。既来之，则不能败之。一切似乎都需要补课，从头开始，包括英文在内。记得在第一学期的“史学方法与材料”课上，我按要求写了一篇题为“*What Is History*”（历史是什么）的作业，教授将我的文章发给全班阅读，但我没有理由感到骄傲，因为文章是经教授改写过的。同一学期，在“世界史比较研究”的阅读课上，足有二三个星期，我忠实地扮演了“哑巴”的角色。并非我不会英文，而是不会讲“史学英文”。令我更为汗颜的是，必读书《西方的崛起》（William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中涉及的许多中国史知识，对我来说居然是闻所未闻的。知识之欠缺，可见一斑。我当时下定决心，要利用一切时间选课、听课和阅读，恶补基础知识。

那段日子非常辛苦，也极为单纯，生活的全部内容是学习，生命的全部意义是求知。丹佛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入门”平台。历史系有十二名教授，学科覆盖以美国史见长。研究生人数不多，相处很融洽。系里每月举行教授聚会，研究生也被邀请参加，酒过三巡之后，其中一位教授会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新近研究，这是学术共同体在课堂之外的延伸。在丹佛的两年里，我选遍了系里开设的美国史课程，还通过担任教学助理旁听了“世界文明史”、“中国史”，并选修了理查森教授的“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美国史研究经历大变革和大转型的时期。新社会史、文化史、少数族裔史、女性研究等新领域方兴未艾，逐渐成为美国史研究的主流，而传统的史学研究——包括政治精英的研究、体制史研究、经济史、思想史、外交史等——则江河日下。但在丹佛的课程设置中，所谓“传统史学”和“新美国史”的课程并列，相安无事。我当时处于入门阶段，对两者都不排斥。所以，我的训练同时包含了两者的内容，这对我后来的写作与教学有长久的影响。

丹佛大学历史系的每位教授对我都有许多帮助，与他们的交往可以写成若干篇精彩的故事，但如果只能写一人，则非古德弗兰德（Joyce Goodfriend）教授莫属。她是一

位优秀的美国早期史专家，她的课使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美国史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后来走上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的道路有重要的启蒙影响。她的“社会史研究”课是我学做史学研究的入门课，也就是在这门课上，我与她发生了一场冲突。古教授要求我们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完成一篇实证研究，当时我刚到美国不久，对新社会史一无所知，不知从何入手。在图书馆苦读数周之后，我看到一篇用人口统计资料来研究内华达州华工历史的文章，很受启发，于是向古教授提出以该文的方法为模式来分析十九世纪后期丹佛华工群体的内部结构，作为论文的一部分，她听后十分赞同。不料，论文写好交给她后，她竟原封不动地退回。我问何因。她说少一样东西。我问少何物。她说，“你用的统计方法从何而来？”我说：“你不是知道吗？”她回答说：“那你为何不在文章中说明呢？”我说：“研究从头到尾是我在丹佛市档案馆完成的，每个字都是我写的，事先向你通报了统计方法的来龙去脉，你也是同意的，而且我还改造了原作者的方法，我错在何处？”她一脸严肃地说：“这都不假。你的研究做得不错，引用也规范，但如果你不说明统计方法的思路受到何人的启发，万一文章发表了，别人还以为这种方法是首先想出来的。”原来如此！我恍然大悟，意识到她的不满所在。古教授平时见了我总是笑容满面，此刻却是斩钉截铁，容不得任何解释。在我加入了关于统计方法的说明之后，她给了我一个“A”。这场遭遇战发生在我第一次上研讨课的时候，为此我感到十分的庆幸。古教授好像有先见之明，这篇习作（包括那个重要的“说明”）后来果真发表了。若干年后，古教授遇到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同事，得知我当了系主任后，对我的同事说：“你回去替我提醒王希一句，是我教会了他怎样做历史。”我可以想见她说话时不无得意的样子，但她的话却并不夸张。

其实，教我美国史的还有历史系之外的一些人，包括我的房东帕特·吉尔莫（Pat Gilmore）和她的丈夫杰克（Jack Gilmore）。帕特是《丹佛邮报》的自由撰稿人，经常带我观摩她参与的公民活动——从限制市区建筑的高度到监管城市监狱中囚犯的伙食质量等。杰克是一位经济学教授，知识极为渊博，像是一部“移动的百科全书”，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时可以做到如数家珍，对美国史的知识更是能够信手拈来。他们家是贵格派（Quakers），宗教礼节不多，晚餐时大家围坐餐桌，相互把手握在一起，就算是做祷告了。每日的晚餐都如同一堂关于美国政治的讨论课，我从中学到不少课本上读不到的知识。理查森夫人是民主党人，当过两届科罗拉多州的州议员，一遇选举，便带我四处游走，观察竞选的幕后活动。丹佛大学神学院的哈定（Vincent Harding）教授曾是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的挚友，我到丹佛后不久，他便邀我去参加他的民权运动思想史讲座。我还在帕特家与一位留宿的印第安人有过长久的交谈。他见了我，毫无陌生人的感觉，径直对我讲述他前晚的梦，描述他逝去的祖母如何在大自然中与天上的鸟儿和

古德弗兰德曾师从新美国史学的领军人物纳什（Gary Nash），她的专著包括：Joyce Goodfriend, *Before the Melting Pot: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olonial New York City, 1664-1730* (1992); 编著有 *Revisiting New Netherland: Perspectives on Early Dutch America* (2005) 和 *Going Dutch: The Dutch Presence in America 1609-2009* (2010)。

Xi Wang, “The Chinese in Denver: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1870-1885,” *Essays and Monographs in Colorado History*, no. 12 (1991): 37-58.

水里的鱼儿和谐相处的情形，让我见证了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在丹佛的华人世界里，我认识了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来自香港的电影院老板和他的越南华裔妻子（未婚同居）、马来西亚的华裔研究生、尚在寻找“伯乐”的来自北京中央乐团的男高音、以及因打孩子被学校告上法庭的福建移民（我为他当翻译）。美国人把他们都看成是“中国人”，但他们相互之间却有很深的隔阂。这种“Chinese-ness”的认同困境为我后来理解美国的族裔和种族政治等提供了直观的背景。总之，丹佛的两年为我“进入”美国史领域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但真正的深造是在1986年8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开始的。

纽约锤炼

进入哥大也是极为偶然的。1985年7月，我应邀参加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举办的美国现代化历程研讨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我后来的导师方纳（Eric Foner）教授。方纳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重建与美国现代化的关系的发言。在结束发言时，他说：“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认为美国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平坦的道路。绝对不是！我们的现代化之路是一条血淋淋的道路。我们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是抱着“取经”的态度，可见方纳的这番话当时带给我的震撼。方纳的发言也成为我立志研究重建的起点。在三天的会议中，我们有过多次的交谈，主要集中在内战与重建的问题上（我在丹佛已经读过他的成名作）。当他得知我有申请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便鼓励我申请哥大，还告诉我说，哥大历史系至今还没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我在会上与普渡大学的伍德曼（Harold Woodman）教授也交谈甚欢，并对他的专长——重建经济史研究——也颇感兴趣。记得我还就选择学校的问题向比我早来美国并学美国史的李岩请教，她认为方纳和伍德曼都是十九世纪美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最优秀学者，跟谁都不会错。不过，收到两校的录取通知书后，我还是选择了哥大。

选择哥大历史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重建史学的发源地和重镇。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历史系先后至少有四位历史学家——唐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比尔德（Charles B. Beard）、麦基特里克（Eric McKittrick）和方纳——分别从传统史观、进步主义史观、修正主义史观和新美国史史观等不同的立场出发，写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专著或通史性著作，数度改变了美国史学界对重建研究的方向，这是美国史学界的一道奇观。我进入哥大时，麦基特里克教授尚未退休（我后来做过他的助教），方纳正值

研讨会邀请了二十五名美国学者和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参加。参加会议的历史学者还包括 Nell Irwin Painter, Steven Hahn, Alice Kessler-Harris, David Montgomery, Barbara J. Fields, Lawrence Levine, Leon Fink, Alan Trachtenberg 和 John Kasson 等。我在会上也见到了一批学美国史和美国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赵一凡、李岩、叶维丽、卿斯美、赵小健、王兴阳、郭琦涛、吴家禄、黄念生等。

重建（Reconstruction）指美国内战结束之后长达十二年（1865-1877）的修复国家机制的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的“二次建国”时期，其内容包括：重新接纳退出联邦的南部各州回归联邦、制定新的联邦宪法修正案、改造旧南部的经济体制、构建新的种族关系等，对美国后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相关著作见：William A. Dunning, *Essays on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Topics* (1898, 1904, 1931), Charles A.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1927, 1929, 1931), Eric McKittrick,

当年，此外系里还有一批十九世纪美国史的专家，包括申顿（James P. Shenton）、布莱克默（Elizabeth Blackmar）以及刚刚加盟哥大的非裔美国人女教授菲尔兹（Barbara J. Fields）等。所以，无论从学术传承还是从师资力量来看，哥大历史系无疑是学内战史和重建史的最佳地方。

与丹佛相比，哥大历史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教授人数众多，专业领域分布广泛而细致。教授要么是本领域的权威，要么是后起之秀，每个人似乎都出奇的忙，讲话直截了当，极少寒暄客套。系里的研究生群体十分庞大（我入校时已累计达到四百多人，仅次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学生的背景多元，并十分的国际化（与我同年进入美国史博士学位的有来自印度、南非、巴西、德国、以色列和加拿大的留学生）。我的同学中有多人在入校前就做过副教授、律师、作家或工会领袖等，还有一位是滚石餐厅（Hard Rock Café）的大股东。他们有着丰富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经验，但在讨论问题时，争先恐后，绝不“温良恭俭让”。我自以为在丹佛已经学会了“舌战群儒”，但到了哥大，才知道差的很远。系里的奖学金制度也很不“人性化”，如果第一年成绩达不到系里期望的要求，第二年就有能被取消奖学金，所以，学生之间的竞争激烈，压力很大。与我同时进入系里的三十多人中，最终有多人未能拿到博士学位。

但是，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博士论文的写作。哥大的美国史博士生训练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以培养专业历史学家为目标，所以，系里要求学生把博士论文当成前沿研究来写。理论上，博士生要接受三年的课程训练，主要以研讨课（seminar）和阅读课（colloquium）为主。这些课不讲基础知识，而是直接将学生带入各领域的学术史和前沿研究之中。我虽然提前一年完成了课程训练并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但在决定论文的选题方面却进展缓慢，直到1989年底才写出开题报告，1990年开始资料的搜集，论文的完成则要到1993年。这样，从进入哥大到获得博士学位，一共用了七年时间，过程之漫长出乎我的预料。

选题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重建研究已有一个世纪的学术史的积累，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最经典著作就产生于这个领域，方纳的《重建》（1988年出版，获班克罗夫特美国史奖）是集大成者，已被誉为是该领域的“圣经”，作为一个外国学生，在这个已经为学生反复耕耘的领域内，我还有什么新话可说？即便有话要说，如何能够做到新话新说？

Andrew Johnson and Reconstruction (1960, 1988), 以及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 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1877 (1988, 1990, 2002)。

关于方纳教授的学术背景的介绍，见王希：《方纳：一个并非神话的故事（代译者的话）》，载 [美] 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512-534页。

我的两位同学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前言”中，说当时哥大研讨课上交锋的观点来自世界上不同的政治运动，包括“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女权主义运动、意大利劳工运动、印度的民主化不结盟运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美国的民主社会运动”等。我认为这是对当时哥大历史系研究生背景和思想多元化的一种生动描述。见：Contested Democracy: Freedom, Race, and Power in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Manisha Sinha and Penny Von Esch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3-4。

这种制度的弊病甚多，造成许多研究生无法完成学业，哥大历史系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目前据说已经改成了普遍实施的一次性多年资助制度。

在哥大时，新旧史学之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我到底应该是去做细致入微的个案研究、还是套用令人眩目的理论去做话语分析、还是回归传统重新检讨经典题目、还是树立新的问题意识将新旧史学思考的问题结合起来？我当时并不知道。另外一个考虑是，无论做什么题目，我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与中国的发展（用当时的话来说，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个人未来的学术成长发生一种持久和深刻的关联。我虽持 F-1 签证，有机会留在美国，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这样做。

我带着这些问题在哥大巴特勒图书馆里读书一年，等于自己给自己开了一门课。我在阅读中逐渐发现了重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首先，黑人选举权（black suffrage）——即内战中获得解放的黑人参与政治的权利——是重建宪政改革的核心问题，重建时期的许多政治纠葛和冲突均由此而起，但对黑人选举权进行连贯而系统研究的著作并不多见，并且大多数研究是就事论事。其次，黑人选举权的立法（包括 1870 年生效的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与实施是当时控制联邦政府的共和党推动的一场宪政革命，这场革命是在借用旧的宪政机制上展开的，但很少有人去讨论推动体制转换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机制，也没有人去分析共和党内不同派别如何围绕黑人选举权问题进行博弈并达成“共识”的过程。再者，既存研究大多是一种单维度研究，要么注重国会或总统部门，要么注重最高法院，或要么关注联邦政治，要么关注南部各州，从未能提供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角度，因而也就无法解释共和党当政时为何无法有力推进黑人选举权的实施、共和党失去对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后为何黑人选举权的原则并没有立即被推翻的现象。此外，也是最重要的，在重建这场宪政革命中，黑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是被动地等待权利的赋予、还是采取行动争取权利？他们是不是新国家宪政秩序的构建者？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提出，打破传统的重建分期（即 1865-1877），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背景下（1865-1891）来讨论共和党的黑人选举权政策的起源与演变，并将黑人选举权建立和实施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与黑人的解放、新联邦国家意识和机制的出现、新旧联邦制的博弈、政党政治的职能化、选举制度的转型等问题结合起来，最终关心的是美国民主的本质与演变。1989 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我在当时想到研究美国民主的转型问题，与那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对我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题目，难怪在开题报告答辩时，系主任加勒第（John Garraty）教授曾对我能否驾驭如此庞大和复杂的题目表示怀疑，好在方纳、申

应该说，想到以“民主”为论文题目，与当时参与“哥大中国学生学者论坛”很有关系。这个论坛是我与几位哥大同学于 1988 年初发起的，当时的想法是为哥大同学提供一个“练兵”机会，让大家在这里交流思想，学习如何做专业学术交流。我们进行了连续两年的定期讨论。讨论的问题包括理论、学术和时事，最引起争论的是“民主”与“自由”这样的题目。一些台湾同学也经常参与，大家往往会因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些“清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促使我想要对美国的“民主”问题做一个实证研究。后来我曾特意在书的前言中写下了一段话，说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我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有用的，因为我们习惯于“对民主进行抽象式的高谈阔论”但却“没有机会以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政府制度的民主”。我还写到，在我们给民主下结论之前，我们需要的是“搞清楚民主是什么、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无论它有何种的优点和缺点、它是如何演进和转化的”。Xi Wang, *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xiii.

顿和布莱克默等人对我表示支持，选题才得以通过。写作开题报告时，方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从他的《自由土地、自由劳动和自由人》(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一书中汲取了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又从他在《重建》中提出的黑人“政治能动性”、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政党官僚化等观点中获得极大的启发。申顿和布莱克默也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帮助。方纳指导学生时，要求学生做到“有备而来”，不得随意浪费时间。他对研究生常说的一句话是：“拿出写的作品来”(show me the writing)。文章交给他后，他会很快阅读，并仔细批改。如有问题，他会马上约你谈话，我们有好几次交谈都是在周末或节假日进行的。

档案研究的过程漫长而辛苦。十九世纪的美国政党至多是一个松散的利益集团联盟，没有党部，也没有集中的档案。研究共和党的立法意图，首先需要确认谁在何时是共和党在联邦和各州的领袖人物和幕后人物，然后要知道这些人是否留有手稿文献(papers)，文献存放在何处等。当时哥大的训练仍然十分迷信“档案研究”，即过硬的论文一定要使用原始的手稿材料。档案研究的确也是最令人感到兴奋的活动，因为你如同寻宝一样，在打开每一个档案袋(folder)之前，都充满了期待，不知道会发现什么意外。我有时想，其实真的不需要发现什么，成天读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和享受，因为你实际上是在与十九世纪的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对话，他们的手迹以及由此表现的喜怒哀乐都让你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一种身临其境的了解。林肯的笔迹是最难辨认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的信也不容易辨认，但一旦认全了，你会觉得他的文采超群。当然，花上一个上午，也琢磨不出一封关键信中的几个关键字时，你也会觉得很沮丧。档案研究使我有机会去美国各地不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寻找资料，它们的风格和管理不尽一致，但服务都是同等的专业，不带歧视，没有刁难，工作人员把帮助研究者找到需要的材料视为自己的一种成就，即便在新罕布什尔州康克特镇的历史学社——这是我去过的最小的档案馆——也是如此。这个档案馆当值的是一位老太太馆员，她到中午必须闭馆一小时。我要是捱到11点59分才起身离开，老太太馆员也绝无不悦的表情。而到了下午1点时，她会准时开门，分秒不差。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新技术成为我的救星。1990年我开始做档案研究时，还是采用原始的笔录和做卡片的做法，速度极慢。当时正好手提电脑刚刚出现，设计原始，没有硬盘的装置，还很贵。我与妻子商量后，倾银行所有，买了一台，又将图书馆用的编目软件Procite加以革新，用来录入、储存和检索资料，速度一下提高了许多。更令我惊奇的是，录入时看不出相互有关联的材料，经某种设定的方法检索和排列，居然会表现出意想不到的相关性，对构思很有帮助。到论文写完时，我已经为自己制作了一个黑人选举权研究的数据库，打印出来的材料有几千页。

论文写作主要是1991-1993年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完成的。罗切斯特曾是美国研究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重镇，聚集了一批美国历史学界研究奴隶制和黑人问题的优秀学者。八十年代末，该校从福特基金会获得巨款资助，建立了道格拉斯非洲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所(Frederick Douglass Institute for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从世界各地聘请了研究非洲和美国黑人问题的顶尖学者加盟，并设立了全职研究员的职位。我的论文选题被研究所看中，因而获得了博士前研

研究员的位置，可以两年不愁吃穿，全力以赴做学问。纽约州是十九世纪共和党政治的大本营之一，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北部政治人物的手稿，包括道格拉斯的手稿。这是我的理想研究之地，我不仅第一次有了宽大舒畅的办公室，而且还直接进入了一个与黑人史研究领域的前沿学者朝夕相处的“学者社区”。我每写完论文的一章，都要在所里的研讨会上宣读，听取各位专家评论，我从不同的评论中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启发。所长凯伦·菲尔兹（Karen Fields）是一位社会学家，与她妹妹（哥大历史系教授）一样，具有非常强烈的理论意识，她的许多“建设性批评”迫使我去重新思考种族与民主的问题。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因与罗伯特·福格（Robert W. Fogel）合作研究南部奴隶制经济学而在美国历史学界也享有盛誉，但他没有一点架子，记忆力极好，有的时候还喜欢幽默一把。记得有一次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我的论文第四章，谈完后我正要去，他突然说了一句：“好像第六十七页的第二段有一个typo（打字错误）”。老头儿说完之后，眼睛眨了一下，顽皮地一笑，好像是在说，不要以为你就十全十美了。我回去一查，果然不假。

与此同时，论文每写完一章，我都要开车带回哥大，交给方纳去批改。论文第一章原本是一个背景章，结果我发现许多最重要的问题都必须在这一章提出来，或埋下伏笔，为后面各章的呼应铺路。但这一章覆盖的时间（1860-1870）是重建宪政改革的高潮时段，头绪极为繁多，现存研究多如牛毛，所以我写得十分辛苦。不料方纳看完后，几乎没有什么肯定性的评论，相反有许多毫不客气的批评。在我犯有明显的低级错误的地方，他会写上“ This is wrong”（错了）或者“ Not true”（不对），再加上一个大大的“！”。看到有原创性的思想——哪怕是一星点火花——他也会注意到。写作这一章（包括二次改写）的时间很长，但这个过程对我非常有用，强迫我学会有效地组织头绪繁多的史料。从第二章开始，方纳的批注开始减少。第三章的一稿还居然冒出几个“ very good”（不错）。到第四章时，姗姗来迟的“ excellent”（很好）也露面了。写到第五、第六章时，我好像突然开了窍，找到了自如的感觉。

论文的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方纳、申顿、布莱克默三位历史系教授外，政治学系的汉密尔顿（Charles V. Hamilton）和法学院的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教授也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非裔美国人学者，汉密尔顿是研究二十世纪黑

除研究所外，与在哥大一样，我在罗切斯特也融入一个非正式的“学者社区”，其中的成员包括在纽约州立大学教书的陈兼、在罗切斯特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的翁乃群（后回到中国社科院民族学所工作）和乐梅（后前往世界粮食组织工作），还有研究所的两位年轻研究员 Penny Von Eschen 和 Osumaka Likaka。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各自的研究题目。我与陈兼在一起单聊的时间最多，他当时为编辑历史学会的刊物和撰写自己的成名作而时常累得死去活来，但一旦听说要聊聊“大问题”，他立刻就会精神焕发，两眼放光。在我的美国记忆中，罗切斯特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做学问的世界。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我后来才知道，恩格曼教授利用去哈佛做演讲的时候，向杜波伊斯研究所推荐我去做博士后，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跟我提起此事。2007年夏，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全球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研讨会上再次见到了恩格曼教授。他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仍然还在继续写作。他甚至告诉我说，“你在论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权利一旦被赋予给解放的黑人，它就会立即产生具有普遍性的效力）我最近还在引用。”我听后非常感动。我离开罗切斯特已经十多年了，他依然记得我的论文。

人选举权问题的专家，威廉斯则以宪法史和种族关系研究见长。看得出来，所有的教授都看得十分仔细，每人在论文上都做了许多的评论和修订，问的问题也十分的专业。在答辩之前，我只是对威廉斯教授有些不放心，因为我知道她一向以深刻的思想和锐利的文笔著称。但答辩开始后，我立刻感到她对这篇论文很有好感。没有想到，突然“发难”的是极有绅士派头的汉密尔顿教授。轮到他提问时，他突然对我高声念了一段与黑人选举权有关的话，然后问我，“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答不上来。他诡秘地一笑，说：“这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话，1965年讲的。”接着他又说，“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这个题目你只做了前半半，我认为你应该继续做下去，把黑人选举权历史的后半部写出来。”原来他这是拿自己的拿手本领来考我！虚惊一场之后，我被答辩委员会告知，论文不仅获得通过，还被提名参加哥大“班克罗夫特最佳美国史博士论文奖”的竞争。后一个决定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甚至不知道还有此奖，后来才知道这是校方为资助美国史博士论文出版提供的一种奖励，尽管我没有获奖，提名一事还是让我觉得有些爽。

《考验》之考验

比这更爽的是我获得了去哈佛大学杜波伊斯非裔美国人研究所（W.E.B. Du Bois Institute for Afro-American Research）做博士后研究员的机会，同时还获得了亨廷顿图书馆的凯克研究基金。突然之间，我有一种苦尽甜来的感觉，兴奋之余，居然飘飘然不与导师商量就直接将油墨未干的论文寄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美国史编辑，看是否有出版的可能。1993年7月，我正在亨廷顿图书馆做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来信说论文已经通过初审，正在外审。信的语气热烈而肯定，好像出版已成定局。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待我8月回到纽约之后，出版社寄来了外审报告，口气由暖变冷。审稿人认为论文立意很好，但有缺陷，最大的缺点是对方纳过于“敬畏”（deference）。其实，我的论文在观点和研究方法上与方纳的著作有诸多不同（方纳自己也是如此认为）。方纳看过外审报告后说，你大概遇到我的敌人了。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盆凉水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决定利用在哈佛的时间将论文彻底修改一遍。哈佛的条件比罗切斯特更为理想，杜波伊斯研究所有二十多名研究员，来自世界各地，专业背景虽不同，但都是研究非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的，同期的研究员中还有多人是美国史学界的著名学者，这令我受益匪浅。每位研究员都配有至少两名研究助理，由哈佛的本科生担任，负责帮助查找资料和打杂。哈佛没有丹佛的热情浪漫、哥伦比亚的咄咄逼人和罗切斯特的田园牧歌，它有的是一种自诩的贵族气息，即便在非裔美国人的社区中也是如此。但在那里教课的确是一种享受。因我同时也是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讲师，必须要开一门课。我于是开了一门“法律、政治与非裔美国人的权利”，课上二十五名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优秀、认真、墨守成规。

也就是在哈佛期间，包括佐治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内的四家大学出版社来信，让我将博士论文寄给他们一读。这次我征求了方纳的意见，将论文寄给了佐治亚大学出版社。该社的“南部法律史系列”在历史学界和法律学界很有影响力，两位主编——

芬克曼 (Paul Finkelman) 和霍尔 (Kermit Hall) ——均为美国宪政史的前沿学者。我后来才得知除两位主编外,出版社还请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的本尼迪克特 (Michael Les Benedict) 教授担任匿名评审人。本尼迪克特是重建研究后修正学派的领军人物,在宪政重建研究方面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并以学术上近似苛刻的严谨而闻名,也许因为如此,他长期被美国历史学会任命为该学会的掌握和解释会规的专家 (parliamentarian)。本尼迪克特的评审报告写得很细致,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论文“不错、达到了出版水平”(good, publishable),在视野方面没有既存研究可与之相比,并为讨论共和党与黑人选举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他随即指出论文的写作和使用的材料是“恰如其分的”(appropriate),做出的结论也是“公允而有见地的”(judicious)。他对论文的后半部分尤其欣赏,认为挑战了为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一些结论,但他对前半部的论述和写作提出了质疑,认为我对北部种族主义思想根源的讨论不够深入、并在某些方面暴露出对美国司法制度细节的不熟悉等。他说,如果书稿要想赢得学术界的“正面的学术性回应”(positive critical response)并在重建史学重要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在他列举的几个方面进行修改和充实。我很看重本尼迪克特的评审,不光因为他是重建宪政史的大家,而且因为他在对重建的解释方面与方纳¹时有不合(方纳语)。芬克曼和霍尔教授的评审意见也随即寄到,他们对论文赞美有加,一致同意小改后即可出版。三位著名宪政历史学家的评论,恢复了我对论文的信心。但我这次没有再飘飘然,而是决定采纳本尼迪克特提出的修订意见,将论文修改为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为此,我制定了一个修订大纲,决定增加新的一章,将研究的覆盖时段改为从内战前夕到进步运动。为了保证书稿的完整性,我要求出版社在出版合同中不加任何字数限制,出版社对整个修订计划十分支持,不仅不限制字数,后来还特别花大钱为书制作了十八幅取自重建时期《哈泼周刊》的整页插图。

1994年底接到出版合同时,我刚开始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任教。我主要承担十九世纪美国史和美国黑人史的教学,外加西方文明史的公共课,教学任务很重,时间显得非常的紧张。所幸我的主要研究已在哈佛完成,需要的只是写作的时间,系里非常照顾我,第一年不让我承担任何行政事务。我将所有的教学安排在周一至周四,将周末留出来用于写作。1995年暑期的四个月,我一个人呆在宾夕法尼亚西部森林的木屋中奋

(Michael Les Benedict), “Report on Xi Wang,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5-1891,” (作者保留的复印件由佐治亚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11月寄给作者)。

霍尔的报告指出,论文的最大贡献是将北部的政治发展在重建时期南部针对黑人问题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揭示出来,而过去的研究则是强调南部的决策如何影响了北部的政治发展。他说,本尼迪克特教授会是一个“苛求的评审人”但他这次居然为作者提出了如此详细的修订意见,实在难得;而就他本人来说,因为这部稿子的质量实在是“太好了”(so good),读起来十分轻松,所以建议出版社不必考虑付给他审稿费。Kermit L. Hall to Malcolm Call (Senior Editor), Columbus, Ohio, 25 November 1994. (作者保留的复印件)。芬克曼教授的评审认为论文的最大贡献是凸显了政治发展与宪法变革的关系,将宪政变化放在一个广大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来讨论,并用大量材料证明重建结束之后,共和党并没有停止推动黑人选举权的立法活动,这本身说明了重建新宪政原则的生命力并没有消失,这一结论“将使许多人感到惊奇”。Paul Finkelman to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Report on Wang Manuscript,” (作者保留的复印件由佐治亚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11月寄给作者)。

笔疾书，那种投入和痴迷带给我一种透彻的喜悦。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与十九世纪的美国人进行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

1995年10月，书稿完成，交到了出版社手中。博士论文是五百四十页，书稿是九百六十页，并增加近四十项统计资料，所以改写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几位审稿人建议的范围。出版社接到书稿后，指定了三名编辑分别负责内容、文字和引用规范的审核。三位编辑看得十分仔细，在1996年3月寄来的审读稿中，大大小小一共提出了两千多个需要澄清或修订的“问题”(queries，即便如此，我的文字编辑还称，这是她看到的最干净的稿子之一)！出版社工作之严谨和认真令我极为佩服，对我后来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也有重要的启蒙影响。

我在阅读改稿时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我从系里一位同事那里得知马里兰大学有一批重建时期自由民局的档案后，决定开车去那里看材料，希望能够在交回改稿之前补充联邦执法官员如何看待黑人选举权的材料。我去的那天，公路上因为半夜下过雪，气温低，路面结了冰，很不好走。我赶路心切，开车比较快，当车开到一个下坡急弯处，车轮突然打滑，刹车无效，汽车一下失去控制，直向悬崖冲去。幸亏路边都有金属护栏，车撞在护栏上。我只隐约听到方向盘的救生气囊“嘭”的一声响，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之后，发现除了车头被撞坏、鼻子表面有些破皮流血之外，其他一切尚好，车甚至还能开。我从车里找出一把剪刀把救生气囊剪掉，继续开车前往马里兰大学，看完材料后当夜又返回学校。我没有找到想找的材料，但却看到了来自新奥尔良市的两位黑人代表在1864年3月10日写给林肯总统和国会的两封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联邦政府以军事需要的名义赋予被解放的黑人以选举权。所有的重建历史学家都知道，林肯曾在1864年3月14日接见过这两位南部黑人代表，并在之后写信给路易斯安那州的军事州长，建议该州准许黑人士兵参加选举，但是无人知道这两位黑人代表在白宫究竟对林肯说了些什么，而我看到的这两封信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兴奋得手舞足蹈，完全忘了自己刚买的新车已经被撞得乱七八糟。后来这两封信都被补充到书的第一章中，为我强调黑人在共和党立法行动之前就已经主动争取选举权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材料支持。

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 (民主的考验：黑人选举权与北部共和党人(1860-1910)，以下简称《考验》)于1997年4月出版，我选择“trial”这个词做题目，是考虑到它有“试验”和“考验”的双重含义。我想用这个双关语来表达一种思想，即重建时期赋予黑人选举权的行动既是美国人进行的一个跨种族民主的“试验”，也是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考验”。我没有想到，《考验》本身在出版之后也经历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

学术书籍的价值取决于专业书评。自1998年初起，关于《考验》的专业书评陆续出现。《弗吉尼亚季刊评论》肯定了它从联邦政治来讨论黑人选举权问题的价值。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LS)认为，它以精到的研究对共和党的黑人选举权政策的起

见：Xi Wang, *The Trial of Democracy*, 12, 311-312 (脚注 39)。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Spring 1998)。

源、实施、演变乃至失败做出一种“透彻的解读”。《内战史研究》也认为,《考验》的研究和写作很优秀,揭示了共和党党内的“共识政治”的崩溃与该党最终抛弃黑人选举权原则之间的联系,并力图将黑人选举权研究带入到超越“即时的种族政治”的宪政史和政治史层面,但该刊的评论也批评《考验》因集中关注联邦政治从而在叙述中将“妇女、黑人和移民”置于“(联邦)行动的边缘地带”。《密歇根历史评论》对我提出的共和党“派别-联合复合机制”(faction-unity complex)解释框架——指共和党内各派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黑人选举权作为一种妥协的共识来追求各自的政治目的——尤为重视。《佛罗里达历史季刊》则称《考验》做到了“立场公允、有思想性、研究扎实、写作流畅”,对黑人选举权的实施和最终失败的原因做了“全面的分析”。

1998年底的《美国史期刊》对《考验》提出了异议。书评者将《考验》与一本研究重建时期联邦自由民局的书放在一起评,指出两书虽都有“许多优点”,但都没有将南部的黑人当成重建政治的主角来处理,因而对这种“从北部白人的角度来写南部史”的做法表示质疑。书评者是“新南部政治史”的提倡者,我曾在前一年的南部史年会上目睹了她和几位同伴与“旧南部政治史”学者的激烈辩论。不等我发言,我在哥大历史系的老同学格林(Michael Green)教授便迫不及待地投书《美国史期刊》,对书评者的意见提出质疑。格林认为,书评者以自己想当然的研究角度设定研究南部史的标准并以此来判断他人的作品,苛求他人,无视两书作者的原始研究意图和问题意识,这样做,对作者是不公正的。格林教授还对书评者提出的南部史必须从南部的角度、使用南部的材料来写作的说法表示批评,认为如果关于南部黑人历史的作品只能从南部黑人中心观的角度来写的话,那南部史研究的前景将令人感到恐惧。格林还批评了书评者暗指的南部史只能由南部人来写作的逻辑,指出方纳教授(也是他的论文导师)“既不是黑人也不是南部人”,而“王教授甚至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的美国史学者,难道他们就没有资格写作南部史和黑人史了吗?《美国史期刊》刊登了格林教授的“读者来信”,同时刊登了原书评者的答复。书评者重申她并不否认《考验》的优点,只是质疑这种使用北部材料来研究南部问题的方法。

其他两家重要的南部史期刊随即也发表了书评。南部史研究的旗舰期刊《南部史期刊》书评指出,《考验》不仅“研究细致,写作清晰”,而且作者在写作中努力“避免使用故弄玄虚的理论(abstruse theory)或晦涩难懂的行话(odd jargon)”,作者使用的是“传统的材料”,但他的研究却具有“广泛的含义”,将会“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重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June 26, 1998), 36.

Beverly Greene Bond (University of Memphis),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Civil War History, vol. 44, no. 3 (September 1998), 247-248.

Robert F. Jefferson (University of Iowa),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Michigan Historical Review (Spring 1999), 191-192; Joe M. Richards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Florida Historical Quarterly, (1999)。

Jane Dailey (Rice University),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and 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the Nation,”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December 1998), 1080-1082.

“Michael S. Green to the Edito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1999), 341-342.

“Jane Dailey to the Edito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1999), 342.

建和镀金时代的标准叙事模式”。这篇书评也对书的一些细节提出了批评意见。《南部文化》认为《考验》的“研究精到，论述公正，写作清楚”，填补了学者们对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及其影响的认识上的“某些空白”(certain gaps)。书评高潮过后，一些美国通史教材陆续将《考验》作为参考书和推荐读物。内战和重建史研究领域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包括普林斯顿大学麦克弗森 (James M. McPherson) 和哈佛大学唐纳德 (David Donald) 也将《考验》列入他们影响巨大的专门史课本的必读和推荐书目中。政治史和宪政史的著作也频繁引用《考验》。1997-1999 年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先后十二次将《考验》提名去竞争美国史领域内的各种学术奖，包括林肯奖和班克罗夫特奖。我当然不指望得奖，提名已经是一种认可。

然而，令我最珍惜的书评是来自方纳教授的一封信。1998 年夏他去剑桥大学讲学，在伦敦看到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据称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书评刊物——对《考验》的书评，立即将书评从报纸上撕下来寄给我，并附了一封短信，其中写到：“(书评)虽然简短，但非同寻常——(因为)他们评论的美国著作屈指可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从来没有评过我的任何一本著作。”

2002 年 10 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一次内战和重建新史学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与其他三十位历史学家一起，在麦迪逊馆顶层的大会议厅里，向来自各地的美国听众解读这段令美国人最难忘却的历史。容纳数百人的大厅里坐满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美国听众，我也许是整个会场里唯一的中国人。突然之间，我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慨：对于这个年轻而伟大的民族来说，重建的宪政改革是一场“火的洗礼”，而我从抵达丹佛时的一无所知到写作《考验》的过程，又何尝不是一种类似的经历呢？

这里叙述的只是我美国生活的一个侧面，或者说只是我所经历的“火的洗礼”的一种。这种或其他的类似经历带给了我们什么，对我们后来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及我的亲人（在我的这篇短文中几乎没有给予他们任何的承认）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我自己是否真的就学到了什么，在获得思想与学术“自由”的同时似乎又同时给自己带上了一

Eric Anderson (Pacific Union College),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lxxv, no. 4 (November 1999), 865-866.

John David Smith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Review of *The Trial of Democracy*,” in *Southern Culture*, vol. 5, no. 1 (2001).

例如：John Mack Faragher and others, *Out of Many: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4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2003); Philip J. Deloria and others, *This Land: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randywine Press, 2003); Edward L. Ayers and others, *American Passage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 To 1877* (Wadsworth, 2006).

James M. Mc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3rd ed., (Boston: McGraw Hill, 2001), B-63; David Herbert Donald, Jean H. Baker, Michael F. Holt,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Norton, 2001), 722; 同见：Robert Cook, *Civil War America: Making a Nation, 1848-1877* (London: Longman, 2003); Michael Fellman, Lesley J. Gordon, and Daniel E. Southerland, *This Terrible War: The Civil War and Its Aftermath*, 2nd ed., (Pearson, 2008).

Alexander Keyssar, *The Right to Vote: The Contested History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Robert M. Goldman, *Reconstruction and Black Suffrage: Losing Votes in Reese and Cruikshank*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1)。

原文为：“...In case you did not see the enclosed, from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of England. Short, but very unusual—they do few US books. The *TLS* has never reviewed any of my books” Eric Foner to Wang Xi, 1998 夏。原件为作者保存。

种新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我觉得用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在美国求学与生活是一种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2003年夏，我曾应邀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刊物《燕园史学》写过一篇题为《美国大学如何培养史学研究生》的文章，我觉得用其中的结语来结束本文也是恰当的，故抄录如下：

在美国读史学研究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一个人要面对各种压力，要面临没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压力，要参与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要接受清贫，要接受寂寞与孤独。要坚持下去，需要一种执着、坚强和豁达的人生态度。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磨练意志和增强能力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磨练。实实在在地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大都会对经历的本身抱有一种比对经历的结果——博士学位——更多的敬畏与欣赏。

载于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82页。

浮生三记

徐国琦

记得在 1983 年秋，我们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部分同学到徽州实习，并结伴到附近的道教圣地齐云山一游。来自穷乡僻壤的我，可谓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士气十足，傻气可能更是有余，但豪气冲天。在饱饮了一通山泉水后，可能被齐云山的壮阔雄伟所感染，竟一个人悄悄的在随处可见的石壁上用石块题歪诗一首。前两句早已忘却，但后两句却莫名其妙的深印在脑海里，至今还记得。这两句是，“它年若显凌云志，跨鹤寰宇当再还！”

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已然而过，人也从干瘦青年变成肥胖中年，虽足迹的确到达世界许多地方，并在美国求学工作近二十年，但所成不多。“凌云志”如果还在，恐怕还是“志”而已。当然也再未回到齐云山。回首前尘，可谓浮生。浮生者，四海漂浮，雪泥鸿爪之谓也。捡点所作所为，唯有三记而已。

读书记

学历史并非我的初愿。上高中时，本来准备考理工科的。但在高考前几个月，因与体育老师发生肢体冲撞后，毅然改学文科。说来突然，实在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我就读的中学即使在乡下，也属条件较差的学校。虽然我的文理科目在学校都属尖子之列，被公认为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因此文科班主任希望我学文，理科班主任则主张学理科。我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认为理科更有前途，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徒。故自然宣布我非理工科莫属。但当时学校的理工科老师水平有限，对于我的许多疑惑题目，我解不出，他们也是一头雾水，爱莫能助，自思能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难度很大。在 1980 年，高考竞争极其惨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对我这种农民子弟来说，要走出贫寒，走向世界，高考是唯一出路。为保证成功，不得已打算牺牲一切可以割舍的东西，全力冲刺高考。其中包括体育课。因此在一次体育课上为了不上课同老师干了一仗。大概我根本不是膀大腰圆的体育老师的对手，在拉扯中摔倒。结果同学起哄，说老师打学生。许多老师也站在我一边，竟然支持我借机所有课都不上，自己全力复习，一举考上大学，为学校争光。老师们的殷切希望，让我突然清醒。仔细权衡之后，觉得我改学文科，可能被高校录取的机率要大一些。因为要在数理化上取得好成绩，优秀老师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但我缺乏这样的老师。但如改文科，凭自己的记忆好，悟性也不错等特质，也许可以自学，并自信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好成绩，问题不是太大。可是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意料，连文科班主任都不敢表示支持，因为离高考毕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了。但我属于脾气极倔的人，一经决定，绝不回头。幸运的是，虽然我高考的英语成绩几乎为白卷（我所在的中学当时没有真正的英语老师），但其它各科包括史地都考得很好，成为 1980 年枞阳县文科高考状元。高考成绩理论上达到、并超过全国所有重点大学在安徽省的录取分数线，但因缺乏英语成绩及填报大学志愿的技巧，结果阴错阳

差地进入安徽师大历史系。

大学四年，生活上极其贫困潦倒，颇为落魄。可谓地地道道的一个坏学生，政治上绝不求上进，学习上属典型的逃课大王。以“六十分万岁”为座右铭。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很少同他人打交道，对女同学更是敬而远之。但我并非自暴自弃，愤世嫉俗。几番彷徨之后，在大三时，决定报考南开大学著名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教授的美国外交史专业硕士生。承蒙杨先生错爱，竟然成为1984年度他录取的唯一学生。

南开几年，在杨生茂教授的严格指导下，才开始了本人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生涯。杨生茂教授，生于1917年，先后求学于燕京大学、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及斯坦福大学。受业于美国外交史名家托马斯·贝利（Thomas Bailey）。1947年开始任教于南开大学，成为当代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少数几个备受尊重的权威学者之一。先生严于律己，治学严谨，敏于思考，文字优雅。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开始系统阅读了中国古代名篇及美国史著作。先生指导学生的一个独特方法是将自己每天想到的对学生有用的心得、书籍等及应做或注意事项写在旧信封或废纸上，在他一日多次的散步途中塞在我的宿舍门下或信箱里。有时一天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即使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先生仍是耳提面命，继续不断提供杨氏手谕或启示录。在南开六年，我积累了大概上千封先生类似手谕。可惜在1990年底出国时将信件及其它物品寄存别处，后来竟不翼而飞了。痛哉！痛哉！

除了手谕及启示录外，先生指点我治学的另一有效方法是寓教于创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杨先生承担了一项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撰写一部完整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我受命写作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从书稿主线、资料遴选，到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时常受到先生多方鞭策，指点无数。耳濡目染，获益比起课堂上的满堂灌不知要强多少倍。杨先生是影响我学术人生中少数几个人之一。记得八十年代时南开美国外交史专业研究生工作比较好找。我的志向是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但就在我尚未最后定夺时，先生有一天一早命我到他家去。到后方知是毕业志愿事。当时研究生可填报三个志愿。先生告诉我，我的第一志愿应填南开，我问第二志愿是否可填别处，先生说还是南开，这时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告诉先生我想到外交部工作，可否第三志愿填外交部，先生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应该做学问，所以第三志愿还是南开。就这样中国失去了一个外交官，但从此世界上多了一个历史学者。

先生虽在我留校问题上，力挽狂澜，一言九鼎，但在其它问题上却比较通融。杨先生是国内首批美国外交史专业博导。但并未强迫我读博。他知道我的志向是要到美国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我答应留校后，我们师徒达成君子协议，我一旦完成美国外交史一书的写作，先生应支持我出国。先生为一仁慈长者，一诺千金。我1990年春顺利收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通知。本应在1990年夏到哈佛报到。可是当时正值六四学潮之后，属非常时期，政府不支持赴美攻读文科博士。直到1990年底，在几经折腾之后，我终于落荒而逃，在迟到大半年后，离开南开来到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国史教授欧内斯特·梅（Ernest R. May）。梅可能是第一个在哈佛历史系从助理教授直接熬到终身教授的人。除历史系外，他还长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他与美国政界保持密切关系，但仕途似乎并不顺，未像许多其他哈佛教授那样，直接参政，亦官亦学。七十年代他在担任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院长一职时，恰逢全国学生反

对越南战争学潮。哈佛学生当然积极参与，曾一度威胁烧毁学校图书馆，并占领其院长办公室，强迫他让步。可能是学运的原因，梅担任院长不到两年即辞职。在当院长期间，梅曾率哈佛教授代表团到白宫，向其昔日哈佛同事基辛格施压，希望美国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改弦易辙。基辛格看来并未买账。梅似乎因此同基辛格的关系闹崩，并一直未修复。九十年代我来哈佛念书时，梅对基辛格刚出版的《外交》(Diplomacy)一书严词批评，基辛格立即反戈一击，两人因此大打了一番笔战。梅的发难，可能与在七十年代与基辛格之间的那场过节仍耿耿于怀有关。

梅教授绝对是那种让人一看就感觉聪明过人的学者，教学效果也相当不错，他讲课时时常穿插一些风趣的故事，让人难忘。我在自己教书时不时借用从他那学来的经，包括他讲的故事，屡试不爽，也颇博得学生的好感。记得我在做他的“越南战争”一课的助教时，有一次向他抱怨说，自己经常记不住学生的名字，自我感觉不好，学生似乎也啧有烦言，故向他讨教有何良策。梅笑咪咪地说，他同样记不住学生的名字。如果有学生抱怨，他就告诉该学生说，“I am a historian and only good at memorizing dead people's names”(“我是历史学家，我的长处是只会记住死人的名字”)。此言一出，很少有学生再叫唤了。此语如同良药，让我终身受用。

我对梅教授虽终身感激，但有一次我可是对他非常愤怒。起因缘于我的博士资格考试。哈佛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的学生在成为博士资格候选人前，必须先通过德文及法文阅读考试，然后按规定选择四门专业，四个老师做主考官，分别以一年时间做准备。梅教授是我的美国史专业的主考官。记得当时同时以梅教授做主考的还有现在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戴维·尼克斯(David Nickles)。戴维和我从梅那儿拿到一份近300本书的书单后，我们俩每周到他的研究室汇报所读的书，并接受他的诘难和提问。一年下来，自己感觉良好。但在资格考试那天，梅的第一个问题就把我问倒。他让我回答在华盛顿总统任期内烟草税占联邦收入的比重。在他所给我的书目中和我们无数次讨论中，我们从未涉及此一问题。虽然我的资格考试顺利通过，但我对他的刁钻问题甚为恼怒，第二天就跑到他的办公室抱怨说，他的问题不公正，有关此问题的内容未出现在他指定的书籍中，他也从来没有在讨论中涉及此一问题。因此我根本就不知道答案。面对我的质问，梅呵呵一笑，答道，“If I know you know the answer, why do I bother to ask it?”(如果我知道你对答案已了然于心，我干嘛还要自找麻烦问你?)。多么聪明的回答。诚哉斯言!

2008年秋，在离开哈佛近10年后，我重回母校深造。只不过这次身份是作为哈佛一个高级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我很快又同梅教授见面。十年未见，梅教授现已80岁了，仍未退休，但还跟10年前一样精力充沛，连新添的皱纹都洋溢着智慧。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对我的新的研究计划“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文化与国际史的诠释”更是显得感兴趣，给了许多建议，并表示愿意在该书出版时为之写序。我们约定等我将手头的一战华工项目告一段落时，我们再一起吃午饭，进一步讨论我拟做的中美关系这一题目。遗憾的是在2009年6月1日，身体一向很好的梅教授竟突然离世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让人不胜怅然!

梅教授虽然影响我很大，但他最终并未成为我的主要指导教师。我在哈佛历史系的导师是入江昭(Akira Iriye)。我在1991初来哈佛后，系里问我是否愿意改投入江昭门下。

入江昭的名字对我来说可谓如雷贯耳。我在南开时，杨生茂教授曾多次向我提起过他，对其学问推崇备至。我在来美前也读过几本他的著作，所以对他并不陌生。我知道他是声名极其显赫的美国史专家，尤长国际史，系 1988 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但我并不知道他 1989 年被哈佛大学礼聘，已成为哈佛的美国史教授。因其新到，研究生不多，故历史系希望由入江昭作我的主要指导教授。我立即欣然从命。入江教授平时不苟言笑，他的几个日本学生见到他时，都诚惶诚恐。其实他望之俨然，即之亦温。我在他面前，从来都不感到拘束，谈笑风生，令我的日本同学十分嫉妒。入江昭教授对所有学生都特别爱护有加。记得每次的讨论班课的最后一节课通常在他的家上，课结束后即开派对，享受教授夫人精心准备的美食。入江夫人不仅有博士学位，且在法国上过正式烹饪课程，所准备的食物当然美味可口。所以通常一学期一度的课后聚会便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盛事，我的许多男女同学更是堂而皇之的又吃又往口袋塞小点心。2008 年我重回哈佛时，曾向入江夫人提到此趣事，她笑得乐不可支，答称她一直有所怀疑。

入江教授很忙，经常下飞机后直奔教室，上完课后又奔赴机场。但任何时候只要我有事相求，他都是立即处理。很多时候，他都在几小时内答复我的电子信，有时甚至一日数次电子信往返，真正是诲人不倦。入江教授虽著作等身，声名显赫，但为人非常谦和。2001 年我任教的一个美国私立学校——卡拉马祖学院（Kalamazoo College），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我代表学校所写的赞词中引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描述他。2008 年我重返哈佛后，与入江教授的交往颇为密切，入江夫妇对我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2009 年 6 月当我快结束在哈佛一年的高级研究院的生活时，入江教授夫妇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为我饯行。入江教授在哈佛的房子于 2007 年失火，最近才刚修复完毕。据入江教授自己说，我是他家近两年来正式宴请的第一人。更让我感动的是，入江教授最近刚刚做完一次大手术，仍在化疗，但那天他本人也亲自下厨，与太太合作做菜。让我享受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晚餐！

亨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是另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哈佛学者。亨廷顿是哈佛政治系（政府系）的教授，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哈佛解雇过，虽然后来被聘回来，并最终成为哈佛屈指可数的几个顶尖教授，但他对自己曾被解雇的经历耿耿于怀。亨廷顿 1993 发表《文明冲突论》一文，轰动全球。他随后在哈佛开一讨论班课，还是围绕文明冲突的问题，他亲自挑选了 15 名不同文化背景及专业的学生上这门课。我有幸成为 15 名学生之一。亨廷顿当时正准备写一本文明冲突论的专书，此课可能是为他进一步写书做准备及铺垫。亨廷顿不大会上课，每次讨论班课开始，围绕当天的主题，他先念自己准备好的一两页纸（有时更长）的内容，然后学生讨论。不过，一学期下来，每个人都实实在在的学到不少东西。我的讨论班论文也有他的详细评语。学期结束前所有修读此课的同学都被邀请到他家做客，享受有专门服务生服务的丰盛食品、饮料及亨廷顿本人讲述的许多有趣故事。讨论班课之后，我有幸成为哈佛国际问题研究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我的研究室与亨廷顿的研究室在同一层，时常有机会碰头。有一天亨廷顿突然打电话要我到他的研究室见他。我到后，他拿出国内刚出版的王缉思主编的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评论文章集。

其中收有我的两篇文章。该书为中文，但附有简短的英文摘要。其中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的英文摘要称我认为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未能逃出冷战思维的痕迹。他似乎对此批评很不服气，要我解释一下我的文章的详细观点。我有点尴尬，根本不知道国内已经出版了这种书籍。但还是大致告诉他那篇文章的大意。显然他不买账，但并未试图说服我。

我哈佛毕业后，应聘到卡拉马祖学院就任一讲座教席，自愿每年教一门国际关系的课程。行前向亨廷顿辞行，并请教他有何建议。亨廷顿问了问我关于此课的想法后，发现我的设想跟他在哈佛拟开的一门新课相近，于是拿出他已准备好的教学提纲包括阅读书目给我，建议我不妨试试他的这份教案，如发现问题，告诉他。他还告诉我当时他在构思一部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嘱咐我如发现相关的资料，希望能与他分享。亨廷顿的教案帮了我大忙。一年后我向他汇报该课的情况，并顺便寄给他我的一位大二学生为此课写的学期论文，该文主要研究穆斯林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认同的影响。亨廷顿立即写信表示感谢，并告诉我他很喜欢那位学生的论文。让我吃惊的是，几年后亨廷顿出版了他的关于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书（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 Schuster, 2005），他居然引用我的这位大二学生的学期论文。虚怀若谷，实至名归！遗憾的是，亨廷顿 2008 年底去世，让我永久失去与他一起把酒话世界的乐趣。

我在哈佛时受惠不少的老师还很多，如韩南（Patrick Hanan）、马若德（Roderick MacFaquhar）、约瑟夫·奈（Joseph Nye）、柯伟林（William Kirby）、包弼德（Peter Bol）等教授对我多有帮助，影响很大。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来，只好待之来日了。

读档记

历史研究的首要条件是对资料的掌握，尤其是对原始档案和多国档案的利用。近二十年来，因为我的课题多属国际史范畴，多国多地读档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个中甘苦，可谓多矣！第一次正式读档是 1993 年夏。那时我在入江教授的鼓励之下决定写有关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博士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自然成为我读档的第一站。记得我访问该馆时，大部分时间只有两位学人，我和我的哈佛同学理查德·霍洛维茨（Richard S. Horowitz）。但该馆同仁不因人少而降低服务质量，工作十分热情，服务尤其专业。更难得的是，它处处为读者着想。读档是件苦差事，但在这里优良的服务环境下，让人如沐春风、事半功倍。中研院之行因此成为我多年读档生活的良好开端。

1994 年我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二档的服务同中研院档案馆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根本就是衙门而不是服务机构。它的宗旨似乎是能不让读者看，尽量不让看；能刁难，尽量刁难。读者的宝贵时间消耗在许多无谓的官僚纠缠之中，让人如坐针毡，事倍功半。2008 年我重返该馆，发现服务质量丝毫没有改善，甚至倒退。仅举一例为证。1994 年时，该馆对读者的复印要求用宋丹丹的小品语言说可谓“那是相当热情”，可能其中有些经济实惠，并对国内外读者实施不同的收费标准。2008 年时，该馆已改公务员制，提供复印大概对公务员们已没有什么物资刺激了，因此能限制则限制。但该馆不准拍照，读者惟有手抄，徒唤奈何。

二档如此，国内其它地方也好不到那儿去。北京图书馆名为国家图书馆，但其管理及服务质量及理念实在与其地位不相称。在我从1990年代到2007年期间的多次到该馆读书期间发现，首先它把读者分等级，所谓教授级、博导级读者，甚至按行政级别的，如有些读物只对局级以上领导开放。由于本人在国外执教，证件不显示级别，更不是什么局长，因此在北图读书时常受歧视。说一件好笑的事。2005年我在北图准备阅读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体育杂志。一打听，在特藏室。但我的读者证该室不认，需高级读者证方可。但按北图规定，我不配有此证。并被告知我想看的这些体育读物只有局级以上领导才有资格看。我不配看。我抱着秋菊打官司的劲头同大概属办公室主任一级的领导展开一场“读书保卫战”。可能这位女干部在两个多小时的拉锯战中被我搞烦了，或者想起了胡锦涛总书记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总之，她同意给特藏室打一个电话，让我看一看只有局级领导才能看的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的体育杂志，而并没有将我当做一个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分子处理。

我在上海图书馆的读书经历也同样不太痛快。2008年我需要阅读有关一战华工的文献资料，但到上图目录室及图书网一查，一无所获。然而根据我的调查，上图绝对有一些相关资料。不得已，到图书馆咨询部打听。答曰，交500人民币，可代为查找。的确，交钱后，很快被告知有不少资料。可由他们代为复印。于是再交高额复印费，方得收货，一如营利单位。后来一看，许多复印的资料文不对题，缺字不少。

近来国内大学纷纷以建立国际一流大学为己任。的确，从硬件看，许多大学已经相当好了。但从软件看，则差距世界一流大学甚远。一流的大学必须是开放的大学，许多美国大学图书馆为了吸引校外学者利用其珍藏，甚至提供旅费。我移居密歇根后，附近的密歇根大学及芝加哥大学很快为我办好长期使用它们图书馆的有关证件，没有任何刁难。但中国的所谓一流大学如北大等，很少有这种开放的胸怀。校外学者如想看其珍藏，可谓难上加难。每次我如需阅读国内大学藏书，经常不敢自己登门，只好请在该校工作的朋友帮忙。一个心胸狭窄封闭且自高自大的大学，无论其硬件多好，是无法成为一流大学的。一个对读书和读档重重设障的国家很难说是一个成熟及自信的大国。

1995-1996年我开始到欧洲继续为我的中国与一战课题读档。第一站是当时德国首都波恩。目标主要是德国外交部档案馆。该馆位于外交部本部内，当时每天只接纳大约十位学者。需提前获准后方能每天进馆。该馆当时还有一条规定，所有国外学者须在到馆一周内出示本国在德大使馆文化处的介绍信，否则即失去继续使用该馆的资格。此类介绍信实属形式，我的美国同学奥利夫·格里芬（Oliver Griffin）当时也在该档案馆看档，他告诉我说美国大使馆有现成介绍信，任何美国人可随时任意索取。可是这种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轮到我却成为无法逾越的障碍。不管我怎么解释，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老爷们就是不肯出这份介绍信。连续三次的碰壁，我不得不得出结论，中国的外交官对自己的国民可谓寸步不让，在他们无理也要搅三分的原则下，我根本就拿不到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介绍信。但德国人办事认真是有名的。每天我进馆时，都忐忑不安，总觉得那位漂亮的德国管理员小姐随时会把我赶出去。本来德国档案里的德文花体字已经弄得我头昏脑胀，拿不出一纸介绍信的紧张让我根本无法专心阅读这些德文文件。忘了是进馆的第几天了，干脆向那位几天来让我如做针毡的管理员坦白，我根本不可能出示中国

大使馆的介绍信。她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后，就把我领到馆长室。该馆长大概也是一个级别不低的外交官，看了看我的资料后说，既然你是哈佛大学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教授介绍来的，我们就网开一面，让你继续在这读档，但我们会向中国大使馆抗议。谢天谢地，抗议是他们的事，我只要能读档就行了。

在德国几个档案馆盘桓了几个月后，转战法国巴黎的外交部档案馆。巴黎六个月，是我读档比较得心应手、心情愉快的时间，没有烦人的大使馆介绍信的纠纷。当时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比较人性化，周末甚至向华人提供便宜饭菜、活动场所，及开放图书馆。看来天下乌鸦并非一般黑。在巴黎外交部读档的一个挑战是必须早起，在档案馆开门前把护照或其它证件交到两位法国小姐处排队。因为每天座位牌发光后，即不能入内。我当时在巴黎拉丁区租了一间屋，与巴黎著名的索邦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及先贤祠仅一墙之隔，并与巴黎圣母院不远。屋虽小，但厨房洗澡间齐全，近地铁。每天起床后，即在到地铁站的路上买一大加长面包加火肠。一分为二，一半为早餐，在路上即解决（颇像当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当学徒工时情景）。另一半为中餐。这样可以不出档案馆门。虽辛苦，但每天的位子得到保证。

在巴黎读档有三件有趣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法国外交部可怜的两法国小姐每天在叫我的名字时不知道怎么发 XuGuoqi。对西方人来说，x 及 q 在中国人的名字里可谓天书。所以每天早晨在嘈杂的接待厅里，我必须注意力集中，因为每到两位小姐在叫名时如有大概 10 秒的沉默时，可能就是我了。我即挤到窗口说：“是我”（C'est moi）。十之八九能拿到我的座位牌。第二件事是有关法国人的法语文化自豪感——法国人只愿意跟外国人说法语。我在哈佛虽然受到法语训练，但我的口语比读要差得远（在我所在的美国史专业，在成为博士候选人之前只要通过德语及法语阅读考试即可）。所以每天进馆后我都得在填好索档单后，要结结巴巴的解释我所要的文件，每天的折磨可想而知。这样被折腾了几个月后，我的法语口语虽有所长进，但仍未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更有趣的是，因为天天在一起，这些档案工作人员跟我们几个常客开始熟悉起来。有一天其中一个竟在闭馆后跟我们几个读档人出去一起喝酒。这位老兄过去不管我在交涉档案时怎么为几个想不起来法文单词憋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他总是怡然自得的纹风不动，假装听不懂英文。现在一杯酒下肚，居然说一口漂亮英文。我当时差点一脚把他踢翻，恨恨地骂道，“You son of bitch! Why haven't you spoken English with me when I have trouble with French in last several months?”（你这混蛋！为何以前不说英文？）

这位老兄脾气倒不错，居然一点不生气。但此后，在工作时他偶尔跟我说英文了。哈哈！第三件有趣的事发生在巴黎郊区的法国陆军部档案馆。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一天，我调阅有关一战期间法招华工资料。等档案收到时，发现法国工作人员搞错了。送来的这一箱子档案属意大利工人为法做工资料。只好请他们再提调我所要的档案。但下一批档案要过至少两个小时才能到，为消磨时间，便随手翻阅该箱意大利工人资料。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就是在此箱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档案里，我找到了我一直苦苦追寻的一卷一战华工方面的重要文件。这份资料莫名其妙的被错放在意大利的资料里，老天有眼，居然因法方档案处理方面的多重失误，让我鬼使神差的发现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哈哈！那一晚回住处后，

一个人喝了两瓶法国葡萄酒！好不得意。

下一站是伦敦。主要目标是英国国家档案馆（当时叫 Public Records Office）。1996年我到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为我的博士论文找资料。记得1996年时，我总觉得他们给我的档案中间有空档，但目录上就是找不到。迫不得已，向该馆资深馆员咨询。过了几个星期，这位老先生答复说，我的感觉是对的。确有五卷一战华工档案缺失。原因是英国在二战时将许多档案转移到香港，但战后并非所有档案都安全返回。他估计这缺失的五卷资料如还在人间则有可能还在香港。他这一“估计”害得我两度到香港专门寻找这批失踪资料，可惜到今天还是劳而无功，毫无线索。好在除此之外，我1996年的英国两个月的研究之行可谓大功告成。2009年1月我在写一战华工一书时，重返英国。找到了许多当年没有看到的文件。我的体会是尽管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但档案研究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要用恒心和耐心，更不能一味依赖电脑，要学会顺藤摸瓜。我的许多珍贵资料就是在电脑目录上没有、档案馆的咨询专家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我用笨功夫旁敲侧击，用铁杵磨成针功夫的慢慢掏出来的。急于求成和想找捷径是档案研究的大忌。

应该指出，读档需要钱和时间。我这人一直比较幸运。在哈佛求学时，其历史系及三大研究中心分别予以研究资助。这三大中心是美国史研究中心（Charle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欧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前面提到霍夫曼之所以给我为到德国外交部档案馆做研究写一介绍信，实乃我当时拿了由哈佛欧洲研究中心的一个较有影响且名头不小的奖学金（Krupp Foundation fellowship），他作为该中心的领头人，有责任给我出介绍信。哈佛甫一毕业，我又幸运地享有美国一私立学院的永久讲座头衔。好处是该头衔含有固定的研究经费，每年不用为经费发愁、到处求爷爷告奶奶。2008年秋我到哈佛一高级研究院作研究员时，院方不但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甚至给我找了四个研究助手。

问学记

司马迁说做历史研究的人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另一位先贤也教导我们讲做人要“立德、立功、立言”。这些都是可望但难及的目标。但身为职业历史学人，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立言，并尽量成一家之言一直是我所追求的人生安身立命方向，也是我为稻粱谋的资本，为公为私都是该做的。要立言并成一家之言当然首先要打好学术根基。在这点上，哈佛历史系的博士训练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首先，它有一套严格而又科学的训练制度。不管学生的程度多高，必须上完规定的课程，读完规定的学分。光上历史课至少要花一年以上的的时间。其次，如前所述，它有严格的语言要求，必须通过两种外语的考试（英语不算）。我的专业外语规定是德语和法语。好在可以考多次，直到通过为止。记得我的一位美国同学德文考了三次才过，感觉他快要崩溃了。再次，博士资格考试。历史系的学生要准备四门学科的资格考试，四门科目必须跨国别和时空。四门必须全过才行。如有一门不过，全盘皆输。每门课目的读书量都很大，因此，每年都有学生考不过。失败后有两种可能，一是卷铺盖走人，二是再受苦一年，来年再考。有趣的是，有时考试失败的原因不可捉磨。也许头天晚上主考教授与老婆干

了一架，第二天可能拿学生出气，让你考不过。我在准备考试时听到的最好笑的考不过的例子是一位考生与一位主考教授的女友有染，结果考试不过。如果说这是活该的话，那另一位同学考试未过可是天大的冤枉——他的落败据说是一位主考官不喜欢他当天的领带。

学分满了，语言关过了，资格考顺利结束了，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进入博士论文阶段。这一阶段通常很长。我在哈佛读书时，历史系拿到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是十年。博士论文非常重要，因为它大都成为第一本专著，成为拿到教职的敲门砖。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却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得是上入江教授的国际史讨论班课（International history seminar）时，我被指定为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书的引评人。引评人的责任是详细介绍该书的观点及一战研究的得失。我指出西方一战研究缺乏国际史的视野，对中国因素的考察尤其欠缺。入江教授即指示，既然如此，我的学期论文应该以此为题，研究一战的中国因素。显然他对我的论文很满意，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以此进一步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好笑的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博士论文会是中国与一战。记得我总是想所谓美国外交的文化因素之类的题目，可见世间上许多事情是没有什么定数的。但歪打正着，我在2002把博士论文修改一遍后，将书稿寄给西方一战史权威学者耶鲁大学的杰·温特（Jay Winter）教授。温特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著名的《一战期间的文化与社会》丛书的主编，他对书稿似乎很中意，立即安排匿名审稿。幸运的是，出版社安排的两位匿名审稿人是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及牛津大学的米特（Rana Mitter）教授。两位对书稿都是鼓励有加，推荐出版。因为两位的评语都是褒奖之词，所以他们也就直接或间接的告诉我他们是评议人。该书于2005年初出版后[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其中文版于2008年由上海三联书店收入人文经典文库出版]，学术界评价很好，温特教授很高兴，后来鼓励我为他的丛书再写一本书，可惜我分身乏术，加上我天生的惰性，至今一直不敢答应。

俗语云，万事开头难。但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的出版似乎一帆风顺，未遇到挫折。可谓幸运之至。我在写中国与大战一书的前言时，对2001年中国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反应予以关注，并把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情感同一战以来的中国寻求国际化与新的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一战与中国一书完稿后，我开始对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的问题越来越有兴趣。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思路开始比较清晰起来，自我觉得可以写一本较有新意的书。我的出版界朋友张瑞德（Anthony Cheung）鼓励我尽快同他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联系。在张瑞德的一再催促下，我在2005年底用电子信给该编辑写了一简短函件，询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当时入江教授建议我不妨向哈佛大学出版社问一问。所以在给芝加哥那位编辑去信的同时，我将同一邮件寄给哈佛出版社的高级编辑林赛水（Lindsay Waters）。林赛水在当天立即回信，表示很感兴趣，建议我马上电邮给他写作计划。芝加哥的那位编辑过了两个星期才答复，虽同样表示兴趣，但为时已晚，因为哈佛明显已捷足先登了，并很快寄给我正式合同。林赛水之所以当时敢对我这位名不见经

传的人如此信任，估计有下列因素。一是选题好，因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选题应该有影响。同时感觉我的角度极富挑战性、学术性，与哈佛出版社的学术地位相称。第二是我的第一本书在西方学术界反响不错，口碑很好，所以我有所谓的学术信誉，并非一穷二白。

第三可能是入江教授的美言。入江系哈佛出版社的董事会成员，他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分量。大概这三重因素促成林赛水的押宝。

我原来的打算是书稿在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后完成，自我觉得写中国与奥运的书当然应有涉及北京奥运会的章节。但生姜毕竟是老的辣，林赛水在谈判合同时，对我的所有条件都答应，唯独就是对交稿日期不妥协，坚持要我在 2007 年春交稿。由于他的英明，该书在 2008 年春顺利出版（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因为时机好，本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及媒体的相当关注。《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杂志》、《南华早报》等众多媒体都发表长篇书评，倒是我始料不及的。该书的两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语相当有趣。一位是包苏珊（Susan Brownell），她是研究中国体育问题的知名学者，对书稿称颂备至，大力推荐。并直接告诉我她是该书审稿人。但另一位审稿人的意见则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声称该书有成为畅销书之潜能，建议我删去相关学术性较强的章节及资料。我读后十分恼火，答辩说：此人大脑进水，所提建议纯属无理取闹、无稽之谈，我无法接受。林赛水收到此答复后，劝我不要火气太大，应该心平气和点。否则董事会在讨论我的答复时会觉得我太中年气盛，心不平，气不和，恐怕有麻烦。因为，出版社一般要在两位审稿人都推荐出版的情况下才正式同意出版。但我属得理不饶人的主，终究没有做多大的妥协。听说还是入江教授在董事会上帮我解释了一下，说徐国琦写此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包，再说哈佛出版社也不是向钱看的地方，重视的是学术。学术性强正是此书的特色。结果社方未找第三位审稿人，直接批准该书立即出版。

2005 年底就在哈佛出版社表示对我的体育课题感兴趣时，我收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五洲传播出版社高磊编辑的邀请信，嘱我做一篇命题作文，写一本关于一战华工的小书。我在 2000 年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应刘青峰主编之命，发表过一篇关于此题目的长文。大概此文的缘故，高编找到了我，声称此书只有我才能写。但当时我不能写，因为我必须全力完成哈佛的书稿，所以就辞了。但第二年高编说社里又为该书重新立项，再次请我撰写此书，并同意我推迟交稿。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2007 年初在哈佛的体育书稿杀青后，开始着手一战华工书稿的工作。在高先生的大力帮助下，写作进展较快，该书在 2007 年底即出中文法文两个版本。中文题目是《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华华工》。由于我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做中国与一战题目时，对一战华工的档案收集很多，在写完五洲传播出版社委托的小书后，觉得意犹未尽，随即准备写一本翔尽的学术专著。经过近一年的思考及研究后，觉得可以正式启动该项目了。于是在 2008 年春询问哈佛是否愿意出版，并很快同哈佛达成协议，签署合同，哈佛建议我 2009 年 6 月底交稿。幸运的是，2008 年春哈佛大学瑞德克利福高级研究院宣布我为 2008-2009 年度研究员，让我得以利用哈佛及研究院举世无匹的研究条件，在哈佛闭关一年，得以按时顺利完成书稿。2009 年九月中旬，两封匿名审查报告均已收到，

双双推荐出版。哈佛定于 2010 年底将正式出版该书。

从 2005 年以来，因为多种书稿压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本打算在哈佛华工书稿交差后，好好轻松一下，不再总是疲于奔命，毕竟已进入不惑之年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我到哈佛后，有机会同林赛水喝酒聊天，一次在一哈佛附近的中国饭店我们俩在冰天雪地的天气下，痛快地大吃一顿火锅。在酒酣耳热的情况下，林赛水问我未来的研究计划。我借助酒劲，告诉他有机会的话我要写一本“惊天地，泣鬼神”的中美关系史杰作，彻底颠覆目前学术现状。原以为这只是吹吹牛而已，当不得真的。未想到林赛水是有心人，对我的这一设想很感兴趣，鼓励有加。并在 2009 年二月，竟送给我一纸合同，不久并附美元支票一张。权作预支稿费。条件是我必须在 2011 年底交稿。面对林赛水的糖衣炮弹，我在犹豫再三后，竟欣然同意，签字画押了。看来此后两年又得长期献给档案馆及书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

余 论

写到这里，本想收笔了。但王希、姚平两位编辑嘱我加写一些我的学术心路历程及对东西方学术观察的内容。只好从命。其实我自 1990 年底来美以后，一路走来，看上去似乎一帆风顺，但自知常怀不安之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我辈在美国从事人文事业，教书育人，实在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偶然也会有，当然机率是很少的，毕竟江山是别人的，文字也非母语。虽自认不比金发碧眼们差，但付出比他们要多得多。常想，与其寄人篱下，不如归去，不时冒出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想法。但回国又害怕“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折磨，所谓近乡情怯是也。故一直进退两难，并一直为五斗米不断折腰。有时想，如果我当初成为数学家，在美国谋生可能要容易的多。至少在语言上文化上要轻松些。在国外教历史写历史，常常为用英文为洋人写及讲解他们能欣赏能懂得的东西感到叫苦不迭，费力不少。“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我在用英文写书的过程中最吃力的不是观点、资料，而是语言。古人云，“推敲一个字，拈断数根须。”对我来说，岂止是数根须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跌跌撞撞中一路走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老婆及孩子的支持可谓关键。（九十年代在写哈佛博士论文时，因进展不快，我曾跟入江教授开玩笑说，能否把三个孩子当作博士论文中的三章交给哈佛。）如果还有任何其它所谓成功的心得的话，那就是一直坚持自我，坚持自我价值，抱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尤其是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文化报有无限的敬意和关怀。自思虽然英文不是我辈强项，但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深层的文化意识及对不同文化的独特理解。多年来，我一直以“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为座右铭。并对自己在南开及哈佛所受的训练充满信心，认为不比任何人差。其次是我对美国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掌握，自我感觉良好。我可以用自己的国际史强项，取长补短，独辟蹊径。我所有研究课题能够得到承认及赞誉，或与能自成一家之言有关，“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好多年前，我同南开著名史家刘泽华先生在南开门口的书店相遇。刘先生站在钱钟书的书前感叹地对我说，钱著之了不起在于做中国学问的读不懂他的洋文部分，恐怕能懂他西洋部分的人又对其中国古典部分不

知所云，所以他厉害。刘先生鼓励我出国后就走钱钟书路线。二十年过去了，虽然有幸忝列西方国际史泰斗入江昭门墙，但我肯定未达到刘先生当年对我的期许境界。不过，有时在把洋人教训得目瞪口呆时，我得承认我偶尔会有点“卖油郎独占花魁”的自喜。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油然而生“曲高和寡”及“千秋功罪，谁人评说”的沧桑感。我的《中国与大战》一书出版后，虽然得到众多书评家的赞许，但真正理解其学术贡献的不多。直到2008年该书出版三年后，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李木兰（Louise Edwards）在她的一长篇书评中似乎开始明白我的真正学术追求及理念。（李木兰现任教香港大学。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与大战》一书的中文版自2008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后，一些国内读者很快予以肯定。）我的《奥林匹克之梦》（Olympic Dreams）一书虽然获得不少恭维，并成为奥林匹克史学家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lympic Historians）2008年度最佳著作及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2008年度最佳研究奖，但大多数人关注的是此书的体育部分，很少学者注意到本书实际上是通过体育来揭示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历程，特别是其在乒乓外交及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研究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翟强兄及香港学者梁文道因此成为少数几个知音。本人近期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完成一战华工专著，除中国外，其中各有专章涉及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多属闻所未闻的故事。出版社约请的一位匿名审稿人竟问该书是为中国史读者写的，还是为欧洲史读者写的，要我做出抉择。此君显然不熟悉国际史的追求及意境。殊不知本书的出发点就是要写一本跨学科、跨国别的书，颠覆所有现存学术分野及藩篱。老杜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但真的登高之后，有时不免要问，高山流水，知音何在？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多次提到诗词意境的“隔”与“不隔”的问题，我觉得治国际史的一个重大挑战也是隔与狭窄的问题。目前的学术分野造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须知“博而返约”是治学的亘古不变的真谛。王国维的学术三境界之首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仍是我辈做大学问的不二法门。只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气魄，方有写宇宙文章的底气。其次是目标一旦确定，必须有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拼劲，达到王国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学术研究第二境界。在“才、学、识、德”四者兼备的前提下也许可以实现佛家所谓的“顿悟”，最终享受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辈生于乱世（1960年代），谋生海外。当国人追求物质文明及享受中国的崛起时（1990年后），我们却平静地在波涛不惊的美国讨生活、求新知。与国内同行相比，我们虽不免有时有只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于诸侯”的消沉。但在不少国人享受歌舞升平，追求荣华富贵，名利双收时，我们这些在国门之外的人因为离喧嚣较远，似乎也许可以更容易有“手挥琵琶，目送归鸿”的潇洒及“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气概及平和心态。唯有如此心态，加上西方的成熟学术评价机制，可能才会更懂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重要。

2009年秋于香江

载于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5-382页。

周末宾州之旅

洪文迁

吃过很多好吃的巧克力，尤其那著名的“吻”，却不知道这家工厂在宾州，还建了一个巧克力世界供游人免费参观。这次周末出行，准备在参观巧克力世界的同时，去兰卡斯特和费城。

在 priceline 网站上拍的旅馆就在兰卡斯特城外。那里是宾州德国人（Pennsylvania Dutch）的聚居地，其中阿米什人（Amish）最为有名。他们在现代社会中仍遵循传统生活方式，不用汽车、电话等，仿佛也不用电，外出用马车。平时不与人冲突，完全逆来顺受。很久前从一部电影（Witness）中知道这个地方、这群人，十分好奇。现在看心境完全不同，听说这里很多年轻人离开了，我很理解——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费城、纽约都近在咫尺，走也走到了——不过，有这样一个老家永远在那里等着浪子们，浪子们足可以野个十年二十年，等到觉得外边的世界很无奈时再回归传统。十年、百年，在阿米什的春种秋收看，也就是眨眼之间吧。

第一天

从特拉华进入宾州，地势开始起伏，乡村风光美不胜收。到兰卡斯特周围，就能看到许多黑色的马车，有些有车厢，连驾手也躲在里面，有些没车厢，能看到穿着白衣黑裙，头戴纱帽的女子驾车，身旁坐着好几个孩子，也都是素色衣衫。仿佛穿越到 19 世纪的欧洲。

巧克力世界在兰卡斯特以西不远，是孩子们的好去处，对于成人，实在乏善足陈。到此一游，也算是作为爸爸妈妈的痴心之举。听说有一个老爸带孩子，在费城上飞机前，明知下午关门赶不到，仍驱车前往，只为满足孩子看一眼的愿望。真是既佩服这位爸爸的爱儿之心，又赞叹巧克力世界的魅力。

兰卡斯特的兰迪斯谷博物馆（Landis Valley Museum）是 18 世纪中期的一间乡村农场，有 200 年的历史，在 20 世纪早期改作博物馆。虽然农牧景象不再，我们仍极有耐心的沿着皮具和印刷房、武器库、农具库、铁匠铺、住宅、小学、藏品库、陶器和铁锡作坊绕了一圈。当然，那所一间房小学让我们感叹半晌，小学的课桌椅边角都做成弧形，门口玄关有挂衣服的一排钉子和放饭盒的架子，门外草地上两间小小的厕所。那课室里有一个大火炉，小时候看插图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女孩幻梦中的火炉就是这样的。

当晚住宿的旅馆中有室内温水泳池，填饱肚子后，我和孩子去泡了个够。好多人举家而来，孩子们欢声一片，不过多数父母并不下池，只在周围椅子上等孩子。有几个爸爸抱着小婴孩在水里玩儿。有对夫妇带着一串孩子，玩到 8 点多钟，父母先抱小的两个上岸，用毛巾兜头兜脸的擦干裹好，放在椅子上。再叫两个中间的上来，递给毛巾被，

差不多了，爸爸看着，妈妈到泳池边再叫，最大的是个金发少女，和新认识的朋友水中正聊得欢畅，不愿起来，妈妈并不多说，一个眼神，这个女孩连忙对伙伴说再见，上来围上毛巾，一家人浩浩荡荡离开了。好家伙，这个妈妈真有权威，我要试试那个眼神，看对 Jane 是否有用。果然，让 Jane 回房间十分麻烦，好话歹话说完、各种眼神用尽，她小人家软硬不吃。不过，气氛始终是友善的，我们都很清楚自己在哪里。

第二天

继续驾车在宾州的美丽乡村穿行，路过小城 Bird-In-Hand，在市场逛了逛，品尝阿米什的甜点和奶酪。接着往费城而去。

在费城，去看了每个游客都会去的自由钟、独立厅、宪法中心、造币厂……这是完成作业，接着在路边小摊买了热狗、汉堡，边吃边往华盛顿路和第九街一带的意大利市场街奔去。为了让 Jane 心甘情愿地陪逛，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爸爸妈妈陪你去过巧克力世界了，轮到你陪我们了，再贿之以冰淇淋，于是顺利到了这条拥挤的小街。

坐在路边，我和 Ig 分喝一杯咖啡，Jane 舔着一个巨大的巧克力甜筒，一边看那些又大又阔的美国车在窄小停车位中左右扭摆，还打量意大利人开的食品店，中国人开的杂货铺，越南人开的海鲜店……

街角一间意大利披萨店，本来并不注意，回转时看到有人买了一角，托在纸盘子上，奶酪烤得黄软喷香，顿时口水直流。推门进去，极小的店铺，招牌上用十几种语言写着“请于此购买食品”。

我指着两个正坐在一边在大嚼的人，对老板说“我就买他们，嗯——他们买的披萨。”后来才知道这里只有一种披萨，上面没有肉，只有香喷喷、软嫩嫩的奶酪，刚烤出来时味道最好。

老板问“你买一整个还是论片买？”

我犹豫一下“买两片。”

“3 美刀。”老板说。没想到这么便宜，一片很大，我没有吃完。

等披萨时，我打量这个小店，一个烤炉烤披萨，一个大平板煎锅煎香肠，还有炸薯条、鸡条之类。老板之外还有两个相对年轻的人，看来一个像老板儿子，一个像雇来的工人。对着街道，还开设了一个外卖窗口。店里有三张台子靠墙放着，墙上贴满了店员和客人的照片。

吃披萨时，正好放学时间，陆续涌进十多个小学生，掏出零钱，有的买一片披萨，有的要一份薯条，老板很是忙了一阵。我发现他直接用手伸进炉膛取披萨出来，再放到盘子里，他儿子则用铲子。不知怎的，想起小时候看的《意大利童话》，其中有个故事，一位姑娘会魔法，把手伸进煎锅，十个手指头就变成十条鱼，她用新长出的手指煎鱼，王子吃了这鱼。最终这位姑娘赢得了王子的爱情。我一直纳闷儿王子吃的是人肉还是鱼。虽然披萨很烫，我没有怀疑和犹豫，吃得很痛快。最后又打包一个中号的带走。

我们决定，下次再去吃。

持续的开拓 不断的创新

——评《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

孙群郎

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旭教授是我国美国城市史这一崭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路人。在美国，城市史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其后不久的80年代初，王旭就在我国最早尝试美国城市史研究，及时地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此后不断拓宽和深化，至今已有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编著和译著问世，仅仅王旭教授个人的研究成果就几乎占去了我国现有美国城市史研究成果的半壁江山，而且还推导出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广受关注的创新观点乃至重大的理论创新，其论著被转引百余次。此外，王旭教授还培养了众多弟子，在美国城市史的很多分领域都有不俗的建树，相关论文百余篇，博士学位论文近20篇，称之为美国城市史研究的“王氏学派”也不为过。而今王旭教授与罗思东完成了《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地方政府》），值得我们关注。该著是王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后半期美国大都市区化与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最终成果，全书共分为6章，355页，38.5万字。

《地方政府》一书的研究视角非常独特，该著将美国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府体制的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为主线，以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和治道的改革为核心，层层展开，结构严谨，逻辑鲜明，内容充实丰富，是目前我国研究美国大都市区发展演变与地方政府体制和治道改革的最高水准的著作。

王旭教授在《地方政府》的第一章“美国城市发展的两大阶段”中，开宗明义地将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殖民地时期到1920年，人口由农村地区向城市集中，城市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逐级递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单核城市的独立发展，城市周边地区在城市的带动下发展，属于传统城

王旭教授在城市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解读》（岳麓书社2003年版）、《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主要译著有：G. W. 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全球族：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认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格雷厄姆·郝吉思：《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主要编著有《城市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城市经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市化阶段。第二阶段是 1920 年以后，郊区化成为拉动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城市发展进入新城市化时期，构成以多中心、分散化、城市与郊区统筹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大都市区。（第 12 页）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多年来美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规律性总结，也是作者在城市发展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

在新城市化阶段，一个令人瞩目的矛盾现象就是大都市区的空间规模越来越大，而地方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小。促成大都市区横向蔓延的主要因素是郊区化的长足发展，而郊区化的长足发展又是由多种原因推动的，其中包括技术因素（交通和公路）、经济因素和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美国郊区渐行渐远，地域面积不断扩展，低密度、分散化成为郊区化的典型特征，这种低密度蔓延的后果之一，就是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空间分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以城市和郊区划分阶级、种族和民族的现象”，即“两个世界局面的形成”。（第 60-61 页）这可以看做是美国大都市区社会的零碎化。郊区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大都市区地方政府的零碎化，即“地方政府不仅在数量特征上表现为大量的碎片，而且这些政府在地域和功能上彼此互相重叠，”“在公共计划中缺乏协调”。（第 71 页）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零碎化及其弊端，推动了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体制和治道方面的改革。

大都市区地方政府体制与治道的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地方政府自身体制的完善问题，其次则是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两者缺一不可，而前者又是后者的基础。因此，王旭教授首先对“市政体制的改革与完善”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由于美国实行的是联邦制，联邦与州之间有着明确的权力划分，因此“联邦政府对城市如何设置没有统一的规定，均交由各州自行处理。各州的体制则五花八门，但大体上都实行市政自治制度。”（第 94 页）在 19 世纪末以前，美国城市普遍实行的市政管理体制是“弱市长型”市长暨议会制。在这种市政体制之下，市长没有实权，立法与行政职能集中于市议会，而市议会很容易受到政党核心小集团的操控，从而为“城市老板”的产生和“无形政府”的形成提供了土壤，造成了市政管理和建设的无政府状态。在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市政体制改革运动。美国逐渐在原来“弱市长型”市长暨议会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三大市政体制，即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和强市长暨议会制。王旭教授通过对这三大市政体制的研究，总结出了美国市政体制内在运行机制的主要特点：其一，分权与制衡原则的适度使用；其二，在城市管理领域移植企业化管理模式。而在城市经理制中，“企业化管理思想得到了几乎是淋漓尽致的体现。”（第 112 页）经过市政体制改革，美国的市政体制有了极大的改善，“彰显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理性价值与科学管理原则”（第 95 页），使城市的管理适应了现代城市发展的需要。

然而，美国城市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大都市区化的时代，城市自身的发展越来越与整个大都市区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然而，由于大都市区的地域面积不断扩大，其范围内的地方政府单位日益增多，同时，地方政府从州政府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其独立性越来越强，从而形成了大都市区政治“零碎化”或“巴尔干化”的现象，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大都市区内地方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削弱了应对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方面问题的能力。早在 20 世纪之初，美国大都市区的零碎化现象就已经初露端倪，并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各种改革理论相继问世，各地改革运动此起彼伏，时至今

日，改革运动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按照改革理论和措施的不同，这一改革运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大都市区政府的改革者们试图将市政改革理论的原则由城市推向整个大都市区，实现“一个区域一个政府”的主张（第 136 页），即通过结构性的改革，建立区域性的大都市区政府。改革方式主要包括中心城市的兼并、市县合并和建立“联邦式”的大都市区政府。然而，传统的改革方式效果并不理想，王旭教授对此总结了 4 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理想色彩浓厚，并不符合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传统和行为习惯；其次，美国地方政府的职能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一个统一的、拥有广泛管辖权的大都市区政府是脱离美国实际的；再次，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和对小规模政府的偏好，让他们对大政府有着深刻的偏见和敌意；最后，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判决和联邦政府政策，鼓励了白人的郊区化。“在一个郊区选民占据政治舞台主角地位的时代，以中心城市为主要取向的大都市区政府改革，确实难成气候”。（第 199 页）

第二个时期为“公共选择”学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由于传统的大都市区政府体制改革难以奏效，到 20 世纪中期，“公共选择”学派异军突起，他们提出了与传统改革理论截然相反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迅速和广泛的影响力得益于美国深厚的地方自治、公民参与以及民管理地方事务的政治传统。”（第 203 页）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该理论将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求比作一个“公共服务产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各级政府都是“公共公司”，而居民则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者。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公司”之间进行竞争，通过提供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服务，为市民消费者提供一系列选择。在这种公共服务产业中，除了公共机构以外，还有私人公司和自愿性组织。在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上是市场性质的，那么，反映在政府体制方面，就应该是多中心的，众多独立政府的存在，可以构成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个中心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然而，公共选择学派“以保守主义的视角理解地方政府的职能，将其仅仅视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因此注重效率标准。”（第 241 页）这也许是公共选择理论最严重的理论缺陷。

第三个时期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区域主义”时期。也许正是由于传统区域主义和公共选择学派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一种将两者优点结合起来的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新区域主义借助于 70 年代以来美国公民社会传统的复苏，以问题为驱动，以治理为核心，主张政府与社会合作，鼓励公民个人、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区域性事务，以弥补政府体制处理区域性事务的效用不足。同时强调州政府的作用，以州议会的立法来替代联邦政府的援助项目，以实施区域规划。”（第 245 页）总的来说，新区域主义改革一改过去单纯强调政府体制改革，更强调治道改革，更注重发挥州、地方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改革措施也更加灵活多样。然而，虽然新区域主义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其发展前景和效果仍需拭目以待。

王旭教授对美国新城市化时期地方政府考察，紧紧扣住了区域主义的现实要求和地方自治传统这一矛盾。区域主义是新城市化时期大都市区治理的客观要求，它强调大都市区的统筹规划，和谐发展，因此要求一个具有区域性质的政府进行权力集中，限制各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利。而这与美国的地方自治、个人主义、民主自由、公民社会等政治

传统形成严重的对立，尤其是地方自治将联邦主义引进地方政府体系，得到了各州宪法或法律的保障，成为克服大都市区政治“碎片化”的结构性障碍，从而增加了大都市区统筹治理的困难。然而，区域统筹和地方自治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孰优孰劣的问题，针对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王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总的看来，大都市区一体化管理和地方自治的分散化现实，也许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非此即彼；而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矛盾并存。两者之间的博弈，也许不会有易于量化的明确结果，但它们通过不断的调整与修正，证明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客观上也使得大都市区政府改革向大致均衡的方向发展，不至于过分偏激。”（第 306 页）

《地方政府》一书结构严谨，逻辑鲜明，层层深入，使读者能够对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脉络和政府改革过程有一个清晰完备的了解。尤其是作者对区域统筹和地方自治传统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令读者深受启发，受益良多。然而，更重要的是，王旭教授在《地方政府》这部著作中，不仅娴熟地运用了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理论，将城市的发展分为“传统城市化”阶段和“新型城市化”阶段。王旭教授写道：“在美国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即从殖民地时期到 1920 年，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由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发展为大城市；城市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内，并且以单核城市为主；在这个阶段，几乎是城市的一统天下，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是城市化的预留空间。这个时期可称之为‘传统城市化’时期。”（第 1 页）“到 1920 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初步实现了城市化，而后，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向郊区扩展。郊区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在郊区化的带动下，美国城市发展突破传统模式，由单核型向多中心型过渡、由局限于城市地区到向外围地区周而复始的扩展，进而形成郊区和中心城市联动发展的大都市区，开始了美国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大都市区化’或‘新型城市化’时期。”（第 2 页）

更可贵的是，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并非灵机一动的天才设想，而是通过长期对美国 and 欧洲城市发展史的考查得出的科学论断。早在 2000 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美国城市史的通史著作《美国城市史》一书中，王旭教授就将美国城市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与此对应，该著在篇章结构上也分为上下两篇，即上篇“殖民地时期到 1920 年——美国成为城市化国家”，下篇“1920 年至今——美国成为大都市区国家”。时隔 6 年，王旭教授在他新推出的涉及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理论层次更高的另一部美国城市史的通史著作《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中，其标题就已经画龙点睛地指出了美国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律，即“从城市化到大都市区化”。在上篇的序言中，王旭教授已经较为明确地指出，“纵观其城市发展，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殖民地时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时期。”在下篇序言中也有了“……这是新时期美国大都市区发展的明显特点，与传统城市化有很大区别。”值得注意的是，王旭教授

参见王旭：《美国城市史》。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上篇序言第 3 页。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下篇序言第 155 页。

已经提出了“传统意义上”和“新时期”这样的话语，表明城市发展的两阶段论已经初步形成。又时隔4年，以解读这一理论为主要目标，王旭教授开始主持“新城市化”丛书的出版，《地方政府》就是该丛书的第一部。在这部著作中，王旭教授明确提出了美国城市发展的两阶段论，或“新型城市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城市化理论就正式诞生了，这可以说是城市化理论方面的最大突破。

王旭教授指出，美国城市史的发展进程，“由于很少受到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因此，发展脉络清晰，带有‘原型’特征，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因此，“美国城市的历史，与一般的国别城市史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然而，王旭教授的“新型城市化”理论，并不是仅仅根据美国城市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来的，而是在同时考查了同等发达的国家西欧和日本，乃至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规律以后，得出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认识，其理论价值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地方政府》一书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特点和优点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其一就是与时俱进，把握动向。这既包括对美国城市发展的最新动向，也包括对美国官方的最新统计，还包括对美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把握，从而不仅使《地方政府》一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以往的美国研究方面的论著，多停留在联邦层面，而《地方政府》则深入到地方政府内部，探讨其结构变迁和运作机理，使相关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充分肯定。

其三，史料坚实，权威性强。历史研究的命脉和价值在于史料的权威性。该著不仅参考了美国学术界的大量论著，体现了学术界对该领域过去和最新研究成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该著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政府调查报告以及学术研究报告，使该成果具有了坚实的科学性、可信度和权威性。

其四，语言优美流畅，用词准确精当，这也是王旭教授所有论著的风格。就其语言风格而论，叙事有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议论有如江河奔流般涛涛，结论有如名言警句般凝练，读之令人愉悦，不忍释卷。因此，《地方政府》是一部可读性较强的学术著作。

其五，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使读者对史实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也让人感到作者并非泛泛而论，使其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此外，该著还有其它一些优点，比如各章插入了一些插图及其说明，直观地帮助了读者对该著的理解。末尾还有附录，尤其是中英文对照的索引，既方便了读者的查阅，又可帮助有关研究人员查阅有关资料。

当然，任何一部著作都难免存在一些疏漏或瑕疵，《地方政府》也不例外。首先是存在一些不太恰当的译法，比如，在“绪论”中，作者写道：“原有的以2500人口为底线的城市（city）概念几乎失去了意义……”事实上，美国“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对应英文单词是urban和rural，而非city与rural。（第2页）而在第34页最后一行，又

王旭：《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上篇序言第3页。

将 the urban 翻译为“都市”，而“都市”的英文词应为 metropolitan。其次是存在一些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第 171 页第二段，作者写道：“县政府是新英格兰地区之外，美国最为传统、基本的地方政府。”而第 172 页又写道“全美有县政府建制的 48 个州……”。这里似乎有误，因为仅新英格兰就有 6 个州。再次，第 28 页第一段的众多数字缺乏出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第 70 页最后一段。然而，瑕不掩瑜，去之更华。尽管《地方政府》存在些许小的失误，但作为一部美国城市史和地方政治史的相结合的厚重的学术著作，确实有望将我国的美国城市史和地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学术动态◆

我会多名会员获得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2010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于近日揭晓，我会多名会员获得资助。西南大学黄贤全的“美国政府的扶贫开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高嵩的“20 世纪美国充分就业政策变迁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刘子奎的“冷战后美国不扩散政策研究”获得规划基金项目资助，大连大学张宏的“当代美国教育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刘敏的“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城市群（BosWash）发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邓峰的“遏制与失败的双重困境：冷战时期美国对朝鲜的政策（1953-1976）”获得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秘书处）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研讨班

2010 年 12 月 4 日，“美国中期选举与奥巴马执政前景暨美国的亚洲政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此次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与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联合主办。来自美国研究、国际关系、政治学、外交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等领域的 100 多位学者与学生出席了会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研究员、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周琪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梅仁毅教授就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与中美关系走向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孙有中教授主持了大会发言。分组讨论涉及奥巴马执政前期功过评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果解读、奥巴马政府的政策趋势预测、奥巴马执政与中美关系等议题。此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参会学者的多国外语背景，涉及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土耳其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从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视角审视美国，这在国内的美国研究领域并不多见。

在美国富布赖特项目资助下，香港美国中心与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成功举办了为期一周的“2010 全国美国研究专业研究生培训班”。该培训班通过系列讲座、工作坊和电影，探讨了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美国历史、社会与文化演进脉络，此外还进行了研究方法的培训和学员研究选题的交流。参加此次活动的学员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等 13 所院校的 20 名美国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在读博士青年教师。他们均经过激烈的竞争选拔出来。培训班的主讲教师包括 Paul Levine 教授、Cheryl Greenberg 教授、港美中心主任 Glenn Shive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李今朝博士、谢韬副教授。

(孙有中供稿)

王晓德教授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日前,2010年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经过《光明日报》等重大媒体的公示正式揭晓,我会会员、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的学术专著《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榜上有名。

据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是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于2009年设立的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层次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推介平台,旨在集中推出能够代表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水平”的成果,充分展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更好地发挥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优良学风打造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2010年度该文库首次征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按照质量第一、优中选优的原则,组织学术界权威专家学者对申报成果进行了严格评审,共有64项成果入选,此次入选的世界历史方面的成果共四项,王晓德教授成果居其一。国家社会规划办将组织国内一流出版社,对上述成果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的方式统一出版,并提供全额出版经费资助。

《文化的帝国:20世纪全球“美国化”研究》是王晓德教授历经5年打造的又一学术精品,全著共92万字,对20世纪全球“美国化”现象从文化的视角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和独到的解析,阐述了美国文化作为其软实力的主要维度在对外扩张中的重要影响。

(此文选自福建师范大学网站,内容有部分删节)

王旭教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学

2010年10月21-24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厦门大学历史学系王旭教授在江西师范大学参加第16届全国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10月21日晚上7:30,主办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请王旭教授为江西师范大学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美国城市与美国历史”的专题讲座。这次讲座是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迎校庆、促发展”系列学术报告活动知名学者学术报告会的第56场。王旭教授首先从美国城市与美国革命、城市与美国西部开发、城市与美国工业化、城市与美国进步运动、城市与“新政”及二战、城市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城市与高科技革命七个方面勾勒了美国城市发展史与美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介绍了美国城市在美国历史建构中的作用。然后,王旭教授用图表的形式向师生们总结了美国城市与世界城市发展模式上的区别,揭示了美国城市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规律,明确地向师生们指出世界城市的发展可以而且应该分成传

统城市化与新城市化两个阶段来理解。最后，王旭教授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指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美国城市发展和世界城市发展中汲取的教训和借鉴的经验。

王旭教授的这次讲座吸引了江西师范大学的许多师生前来聆听，在问答阶段，师生互动的效果非常好。许多同学结合目前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向王旭教授讨教，集中的问题包括美国西部开发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意义、城市贫民窟问题、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问题等。王旭教授在回答了十几个问题后，仍然有许多同学举手提问，只可惜时间有限，不能一一满足他们的提问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旭教授的讲座很精彩，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共鸣，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史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学科，美国城市史和世界城市史越来越受到关注。

(杨长云供稿)

李剑鸣和王晓德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2010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应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的邀请作客该中心新启动的“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作了“新史学语境中的方法论取向”的精彩演讲，拉开了“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的序幕。李剑鸣教授首先分析了当前新史学发展的新趋势，阐述了欧美史学研究范式的变迁、研究题材的变化、所用史料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创新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欧美史学发展的总趋势，即民主化、多样化、去中心化、开放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然后，他讲述了如何保持方法论意识。在这一部分，他明确提出史学研究要保持批判的精神、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运用历史语义学的知识，贯彻语境主义的思想。最后，李教授还回答了参与师生的问题。李教授结合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讲述了新史学发展中的方法论问题，深入浅出，博得了在座师生的普遍好评。

12月1日上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院长、闽江学者王晓德教授应邀来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范孙楼432室做了一场题为“从好莱坞影片透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基地举办的“世界近现代史名师讲坛”系列讲座的第二次讲座。他将好莱坞影片与美国文化价值观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谓独具匠心，别出心裁。王晓德教授认为，美国文化分为“无形”和“有形”两种，“有形”的文化成分超越了美国疆域，有效地改变了生活在另外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境外影响，自然少不了对传播美国生活方式起过很大作用的好莱坞，因为好莱坞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势必反映出了美国人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影片体现的美国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拯救落后国家；(2)铲除邪恶；(3)拯救地球；(4)美国精神；(5)美国大众文化与欧洲贵族文化的鲜明对比。讲座后，王晓德教授与师生们进行了生动活泼的交流，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回答了师生的提问，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南开大学期间，王晓德教授还与历史学院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结合自己多年研

究的体会与中心师生畅谈治学经验,强调了利用原始资料和提高中外语言功底的重要性。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了加强基地对外学术交流,中心决定开展“世界近现代史名家讲坛”活动,邀请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到基地讲座,将自己的研究心得、最新成果、学界动态等介绍到南开。

(张聚国综合报道)

王晓德教授在浙江大学讲学

2010年10月14日晚七点,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者”、社会历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德教授以浙江大学求是史学讲座为平台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历史楼报告厅为浙大师生做了题目为“从好莱坞电影透视美国文化价值观”的精彩学术报告。报告主持人为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国柱教授。

王晓德教授首先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今夏卖座大片《敢死队》为引,向听众们厘清了市场化运作中的好莱坞电影之特征与实质——迎合观众与票房的商业片。并以该片为例向在场师生解析了美国人独特的英雄观。王老师独到的分析视角令在场师生无不感到耳目一新。

随后,王晓德教授又以布鲁斯·威利斯的《太阳之泪》(威利斯扮演的海军陆战队小分队营救在非洲某国不畏艰苦行医救人的女医生,最终付出重大牺牲后战胜残暴独裁的叛乱者将女医生和该国总统之子以及难民一起送至安全地带)为例,并结合史实,向听众们分析了影片中所展现的美利坚民族的基督教精神与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而后又将这种精神和使命感引申升华,进一步从基督教上帝与撒旦的对立分析到了美国人心目中非正即恶如摩尼教般的善恶二元对立情节。这一精辟而独到的分析,对我们深入了解美国文化大有裨益。

接着,王晓德教授又以美国众多的灾难大片如《2012》为例,并加以对比只能顾及一城之难的中国灾难片以及摆脱不了岛国情节的日本灾难片,来分析影片背后美国的全球视野。王晓德教授通过史实分析指出这与美国立国之初的基督教精神以及所谓“山巅上的圣城”的观念颇有渊源,这正是美国在其例外于全世界的自豪感以及要以自己之范例改造全世界的使命感的体现,也是美国建国以来不断对外扩张的思想之源。

之后,王晓德教授以《飓风营救》(退役特工为救爱女单枪匹马进入巴黎大战腐败的法国警界与邪恶的黑势力)为例分析了影片中以及影片所反映出的美国人的正义形象以及透过美国电影在美国人眼中所反映出的外国人的丑陋与邪恶,借以论出美国人在爱国观上的特点。王晓德教授还以当年的全球票房之王——《泰坦尼克号》为例,用与众不同的视角为大家分析了影片背后所体现出的美国平民文化与欧洲贵族文化的碰撞。

在整个报告中王晓德教授用幽默的语言,以独到的视角,通过在中国和美国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生活经历以及翔实的史实使到场听众在丹桂飘香的西子湖边享受了一场丰盛的文化盛宴。最后王老师认真地回答了到场师生的提问,报告会圆满结束。

(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

高春常教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

受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高春常教授自2010年2月22日起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所进行了期限为半年的访学工作，8月31日启程返国，9月2日凌晨抵达烟台。

高春常教授所在的办公室位于哥伦比亚市南卡罗来纳大学库珀图书馆二层，负责接待高春常教授的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研究所的弗朗西斯卡·费尔女士和玛格丽特·吉列肯女士。刚到哥伦比亚市不久的25日，高春常教授即在该机构负责人丹尼尔·利特菲尔德教授以及历史系教授马克·史密斯教授的陪同下，听取了美国著名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教授关于林肯的学术报告。3月24日至26日，参加了非裔美国人研究所组织的“南卡罗来纳大学与21世纪的非裔美国人研究”学术研讨会。3月31日，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哈里斯·帕斯蒂德斯先生及其夫人在校长办公室接见高春常教授并接受赠书。5月4日中午12点至下午2点，高春常教授在历史系主楼成功举行了题为“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新教”的学术报告，报告由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院的马克·史密斯教授主持，吸引了几十名包括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在内的听众，有关信息公布于南卡罗来纳大学网站主页突出位置。7月23日，高春常教授参加了由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先生致辞的南卡罗来纳大学霍林斯图书馆落成典礼。

南卡罗来纳大学库珀图书馆的藏书丰富，名列美国前茅。高春常教授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开展“美国黑奴宗教中的恍惚、幻觉与草药”的研究。不久根据研究进展，将题目调整为“美国黑奴宗教叙事研究”，为此搜集了大量资料。与此同时，还到南卡罗来纳图书馆、南卡罗来纳档案和历史部和南卡罗来纳音乐图书馆进行资料搜集工作。目前，高春常教授初步打算以此为基础写作新书。

为了增进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直观认识，高春常教授还相继参观了查尔斯顿市、默特尔比奇市、华盛顿特区和亚特兰大市。哥伦比亚市的运河、非裔美国人墓地和第一浸礼宗教堂、查尔斯顿的奴隶拍卖市场、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史博物馆、国会图书馆、道格拉斯故居和福特剧院、亚特兰大市的马丁·路德·金中心，等等，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高春常教授回国前的8月30日，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的联系人马克·史密斯教授及其夫人里根，还有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和博士生专门开了一次欢送会。马克·史密斯教授说：“我感谢你对我校学术生活做出的难以估量的贡献……我以称呼你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而感骄傲。”

（高春常供稿）

韩宇副教授在波兰华沙大学访学

我会秘书长、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获得欧盟伊拉斯莫斯外部合作窗口项目(Erasmus Mundus External Cooperation Window program, 简称 EMECW) 的资助, 于 2010 年 9 月到 11 月赴波兰华沙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访学。伊拉斯莫斯项目是欧盟著名的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框架。旨在通过支持亚欧人员交流, 促进双方高校间的多方面合作, 以促进人才、知识以及技能等方面的交流。2010 年的 EMECW 是该项目首次与中国的高校展开合作, 10 所欧洲的著名大学和 10 所中国知名高校参与其中。

◆会员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武寅副院长、张顺洪所长看望黄绍湘先生

2011年1月26日，世界历史研究所张顺洪所长陪同武寅副院长看望、慰问美国史研究专家黄绍湘老先生。为她送去了新春的祝福和慰问品。在慰问的过程中，武寅副院长与黄绍湘先生及家属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黄绍湘老先生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武寅副院长看到黄绍湘老先生身体健康，高兴地说，看到您身体好，我们就非常高兴，希望您保重身体，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世界历史研究网）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部分在京顾问小聚劲松

在2010年岁末，2011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部分在京顾问小聚在居住在劲松华威北里方生先生家，随后来到武汉大厦的鄂色天香就餐，这是一次学术圈朋友间难得的私人聚会，与会年龄最大的是85岁的著名美国史学家和资深出版人邓蜀生先生，东道主方生夫妇均是年过八旬的商务印书馆资深老编辑，与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黄柯可研究员也已经七十。在职的中国法制出版社社长祝立明顾问已年近60岁，唯一年富力强的算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法人代表、社科院世界史所图书馆馆长孟庆龙研究员了。我在七人中算是年龄居中的一位。

这次私人聚会由方生先生发起，原定“十·一”国庆期间安排聚会，后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直到今天，深感即使在北京办次聚会也实在不易，同行之间虽在北京但见面机会并不多，大家都年事已高，今天难得的聚会自然有说不尽的话题，谈不完的故事，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2时才散。感谢方生夫妇的精心安排，也感谢祝立明、孟庆龙还在紧张工作之余专程前来和退休老同志聚谈。

（黄安年的博客/2010年12月26日发布）

山东大学王玮、陈海宏教授出席学术会议

山东省世界史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潍坊学院举行。我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王玮教授和常务理事、山东大学陈海宏教授等出席会议。王玮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武汉大学潘迎春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生

我会常务理事、武汉大学潘迎春2009年11月晋升教授，并于2010年6月确定可以招收2011年度的博士研究生，方向有两个：美国史、加拿大史；英语国家对外关系史，已经列入武汉大学2011年度的招生计划。第二个方向以后可能还会有变化。

◆新书讯◆

黄安年著《道钉不再沉默：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出版

2010年6月，辽宁沈阳白山出版社推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先生的新著：《道钉不再沉默：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这本书是黄先生于2006年出版的《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一书的“姊妹篇”，是对黄先生迄今为止有关华工在美国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贡献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本书收录了《沉默的道钉》一书中的一些文字、图片和参考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大量补充，还收录了黄先生正式发表的3篇相关学术论文以及他发表于个人网站和博客上的有关文章，阐述了这一课题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在本书的末尾处，收入了国内学者有关《沉默的道钉》的4篇书评。对于建设北美太平洋铁路的华工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理解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华裔美国人的历史经历。全书352页，共34.6万字。

张德明著《亚太经济和历史论文集》出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张德明教授著《亚太经济和历史论文集》于2010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作者从事亚太地区经济史和亚太地区历史研究的心得和体会，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

第一，亚太经济史研究，共15篇。其中，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亚太经济的文章3篇：《金银与太平洋世界的演变》、《法国殖民统治对“太平洋阳台”经济的影响》和《浅谈环太平洋经济网络产生》；关于美国外贸和外交政策的3篇：《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美国在亚洲的石油扩张（1860-1960）》和《冷战前期美国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当代东亚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的1篇：《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太经济的发展》；其余8篇为东亚经济中美日关系系列论文：《论战后初期美日亚太经济战略的形成和一致性》、《亚太经济中的美日“蜜月”初探（1947-1965）》、《略谈亚太经济中的美日竞争（1965-1985）》、《论美日经济同盟的瓦解》、《亚太经济中的美日关系影响因素》、《美日与东亚金融危机》、《美日关系对亚太经济的影响》和《美日经济关系的启示》。

第二，亚太历史研究，共6篇。其中，关于葡萄牙16世纪在印度洋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以及美国18世纪向太平洋扩张的论文各1篇：《论16世纪葡萄牙在亚太地区扩张活动的性质》、《国际机遇的利用与美国向太平洋的领土扩张》；中国对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反应1篇：《论17世纪中国的开放倾向》；探讨中国统一的3篇：《太平洋外交与中国的统一》、《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原因》和《论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统一中的作用》，这最后一篇实际上是论经济关系在19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统一中的作用，但其目的在于为中华民族的统一提供历史经验。

本论文集中有5篇选自拙著《东亚经济中的美日关系研究》的内容，稍有修改。其

余 16 篇都是载于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内容依旧，只是统一了注释。原来的注释形式有的是脚注，有的是尾注；有的将英文著述名称译成了中文，有的没有。本书一律采用页下脚注，保留英文著述原来的英文名称，不译成中文。

李爱慧著《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出版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李爱慧著《文化的移植与适应——东欧犹太移民的“美国化”之路》于 2010 年 2 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40 页，28.5 万字。本书以 1880-1920 年间东欧犹太移民为焦点，从文化移植与适应的视角考察了其适应与融入美国社会的经历，揭示了他们独特的“美国化”之路。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导师是李剑鸣教授。

该书选取 1880 - 1920 年代涌入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移植与适应的视角探析其融入美国社会的经历，即他们的“美国化”之路。犹太移民在东欧的生活经历塑造了其特有的职业选择倾向和文化价值观，正好适用于美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开放的教育机会，因而得以迅速崛起。他们还具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和互助传统，建立了发达的互助组织，有效地保障了群体生存。面对主流社会的同化压力，犹太移民没有被同化，而是走出独特的文化适应之路。他们的正统犹太教信仰和意第绪语言文化在美国环境中被重塑，但其精髓保留下来。经历了文化的移植与调适，他们成为一个既包容于美国主流文化之中又保持其一定独特性的亚文化群体。

尤建设著《美国对印度援助研究（1951-1971）》出版

许昌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尤建设著《美国对印度援助研究(1951-1971)》于 2010 年 9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论述 1951 ~ 1971 年美国对印援助的发展演变。该书认为，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政策是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政策既有益于理解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同时对我国制定援外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全球冷战背景之下，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美国对印援助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而不断发展变化。

杨长云著《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出版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杨长云著《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于 2010 年 12 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王旭主编“新城市化系列丛书”之一，是在杨长云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该书以

美国新城市化嬗变期的市民社会和城市公共空间及其关系为主题，聆听“公众的声音”，具体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城市公共空间的整饬和改革这一中心议题，从而解读“城市与人”的主旨。全书共 411 页，46 万字。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这个世纪之交，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美国新城市化的嬗变期。随着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亦随之产生。城市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是城市社会问题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国家、社会 and 个体三者关系的领域。19 世纪末以来，面对城市公共空间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美国民众发出了抱怨和不满的声音；市民化的民众在中产阶级的引导下终于觉醒，他们共同发出了改革的呐喊；不过，伴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集体主义逐渐向个人主义渗透，个体追求自由的努力一直存在。从政治和文化意义来看，在世纪之交的这个文化周期里，个体的自由问题和以往一样是城市的重要主题。同时，这三种声音既反映了美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真实，也展示了在城市公共空间上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社会 and 个体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旧金山、洛杉矶、丹佛、圣路易斯等城市发生的公共空间的整饬和改革的历史，表明了这场世纪之交的社会运动的普遍性意义。这样的普遍性还表现在大西洋两岸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所共享的普世价值和思想观念——表现为“工艺美术”风格、巴洛克样式、新古典主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当然，美国一贯的作为在于它能够用那些共享的思想或方法制造出独具特色的结果，在本书中，这种结果表现为三种声音所表征的“公众”和市民社会的意义；以及城市公共空间的整饬和改革所反映出的独特的政治、文化模式和民主气息。

围绕美国新城市化嬗变期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整饬和改革的历史叙事，探究这一时期美国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变迁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去发现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如何经历流变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源是如何流动的，是该书试图有所创新的尝试。作为“文化转向”的城市史研究，该书提出“城市与人”的分析框架，以期丰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同时为相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提供一个分析的视角和路径。应该说，对于那些现今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美国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经验显然能够提供一些借鉴和启迪。

陈志杰著《顺应与抗争：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文化》出版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志杰著《顺应与抗争：奴隶制下的美国黑人文化》于 2010 年 6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258 页，22.8 万字。该书从文化的视角，重点阐述了奴隶制下黑人奴隶的物质生活、家庭生活、宗教生活和娱乐活动，指出奴隶们一方面顺应艰难的环境谋求生存、另一方面竭力抗争的两面性。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导师是李剑鸣教授。

◆会议预告◆

“族裔与美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预告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将于2011年6月10-12日在天津举办一次主题为“族裔与美国社会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诚邀国内外学者参加，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流。会议对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涉及的时间范围没有要求，可以涵盖从美国殖民地时期一直到当代美国社会的任何时期，论文可以是与美国的族裔和种族有关的任何题目，可以探讨不同族裔群体移民美国和适应美国社会的经历，各族裔反对歧视争取权利的斗争，可以分析不同族裔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追溯美国政府的族裔政策和主流社会族裔观念的演变，也可以探讨不同族裔群体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和外交等领域的深远影响。欢迎国内外学者积极准备参加此次会议，撰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会务联系人：

赵学功 zhaoxg@nankai.edu.cn 电话：022-23505296
丁见民 dingjm@nankai.edu.cn 电话：022-23506475
张聚国 zhangjguo@nankai.edu.cn

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预告

由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协办的“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将于2011年7月7-1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会务组已于2010年6月寄出会议的第一号通知，说明了会议的由来，简单介绍了美国世界史学会、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的情况。因提交参会论文中英文摘要的日期临近，会议的一些细节也进一步明朗，现寄出会议的第二号通知。主要事项如下：

第一，本次会议有两大议题：世界历史上的中国（China in World History）；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from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围绕这两大主题，附录中是部分拟将开设的分论坛论题，参会者可以围绕这些论题撰写论文。

第二，请于2010年12月31日前，把学术论文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1000字以上）发到会务组电子邮箱：wha2011@163.com。因参会人员较多，我们将根据论文情况发出会议正式邀请函。本次会议是美国世界史学会的年会，按照其惯例，要提前半年编订会议手册，安排具体的发言时间和地点。因此，请务必在2010年12月31日之前提交中英文摘要，否则将无法安排会议发言。

第三，提交中英文摘要时，请顺便提供以下信息：工作单位、详细的通信地址（包括邮编）、电话、Email地址。

第四，中国参会学者不交会务费、餐饮费和资料费，但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第五，本次会议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少数分论坛可以使用中文）。

第六，关于会议筹备的最新进展情况，请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网站。

网址：www.global-history.org

如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我们交流，也可以电话联系。

联系人：于展：(010) 68902312 (办) 13439370732 yuzhan1978@126.com

夏继果：13671307876

陈志坚：13810577086

会务组邮箱：wha2011@163.com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全球史研究中心

2010年11月

附录：“美国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部分参考论题

一、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1. 全球史理论与中国史研究
2. 考古视野下的中西文化交流
3. 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各文明的互动
4. 古代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迁徙与文化交流
5.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与交流
6. 古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
7. 外来宗教与中外文化交流（19世纪以前）
8. 宋元明时期的海外贸易
9. 蒙古帝国（包括元朝）时期欧亚大陆上多元文明的互动
10. 中国四大发明的外传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11. 郑和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12. 西学东渐：明清以降耶稣会士的东来与西方文明的传播
13. 汉风远被：明清以降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影响
14. 17 -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明的互动与比较
15. 19 世纪的中国：从“天下”秩序到“世界”体系
16.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扩张背景下的中国与日本：相互影响与比较
17. 西方话语与清末民初知识界的观念变迁
18. 华侨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19.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革命
20.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中国模式

二、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

1. 全球史研究中的中心与边缘：理论思考
2. 族群认同与文明中心的形成
3. 古典时代轴心文明的中心与边缘
4. 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与影响
5. 中世纪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动
6. 17 - 18 世纪欧洲与美洲的贸易体系
7. 19 世纪以前的印度洋贸易体系
8.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诸问题
9. 文明互动中的中心与边缘意识
10. “他者”形象：中外史志中的“外夷”
11. 世界历史中的传染病：传播与影响
12. 历史上的跨文化实践与交流：留学与翻译
13. 移民与全球化
14. 战争与记忆
15. 冷战时代的北约与华约
16. 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建筑、语言、人口

编后记

可以写编后记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感激，感谢为我们提供稿件和信息的各位会员！特别是王希和徐国琦教授。他们慨然应允我们登载《在美国发现历史》的精彩片段，为本期通讯增加的不仅仅是厚度，更重要的是，使通讯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吸引眼球。欢迎大家把读后的所思所想发给我们。也希望这个栏目能够继续下去。

这里还要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的顾问前辈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尤其要感谢刘绪贻教授、黄绍湘和黄柯可研究员给我们寄来的贺卡，感谢李世洞和黄安年教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感谢方生编审寄来的书籍。老一辈会员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感动，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希望一如既往能够得到老一辈会员的支持，也祝各位前辈身体健康，永葆青春！

2010年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有三位成员永远地离去，我们深感悲痛。在5月4日、11月24日、12月10日，杨生茂、黄华和李存训先生先后离开了我们。纪念杨先生的专刊的编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若有会员撰写纪念文章，通讯将继续刊出。也欢迎撰写纪念黄华和李存训先生的文章。

研究会网站的改进是本年度秘书处的工作重点。几次改版已经为网站的运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向广大会员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是研究会网站的宗旨和目标。欢迎各位会员积极参与，献计献策。

2011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世界史一级学科的设立，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成长壮大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让我们共同努力，抓住这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美国史研究更加美好的明天！